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

宋一秀 陈战难 杨梅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哈尔滨

前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概括地回顾了我党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历史；科学地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实事求是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和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方向。

党的《决议》，三万余言，但贯穿于《决议》始终的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否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就会迷失我们前进的方向，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容许的。因此，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基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就能够正确地阐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就能够指导我们找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就能够指引我们胜利地走向未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哲学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也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实践表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结合和运用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许多哲学理论问题上，都富有自己所独具的系统性、鲜明性和创造性的特色。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

^①《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1页，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概括，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或者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是联系中国革命经验来论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所固有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我们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能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和特征，也就不能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概括。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又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范例，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战略和策略等方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展开和发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这八篇著作，对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过去是我们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今后仍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它、研究它、捍卫它和发展它。党的《决议》为我们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牢牢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它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的思想。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2)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2)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6)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11)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22)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	(23)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时期	(31)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完全成熟时期	(35)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光辉发展的时期	(40)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	(44)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时期	(49)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52)
一、从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上，充分发挥了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53)
二、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地论证了 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56)
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上，集中论述了 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57)
四、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阐明了 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	(60)
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研究军事科学， 对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作出了崭新的贡献	(63)
六、致力于哲学的解放和哲学的群众化，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66)

简短的结论	(72)
第二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	
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	(74)
第一节 《实践论》、《矛盾论》	
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74)
一、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物	(75)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反对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结果	(77)
三、它是指导新时期伟大斗争和端正	
全党思想路线的需要	(81)
第二节 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	(83)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83)
二、实践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基础	(89)
三、两个飞跃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辩证途径	(97)
四、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和党的群众路线	(105)
五、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109)
第三节 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	(115)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115)
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127)
三、要着重找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特殊性	(141)
四、具体把握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49)
五、正确认识 and 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155)
简短的结论	(162)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和辩证法发展的新篇章	(164)
第一节 唯物论在战争中	(165)
一、战争的起源和本质	(165)
二、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从事战争的目的	(167)

三、兵民是胜利之本·····	(171)
第二节 认识论在战争中·····	(175)
一、战争中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176)
二、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	(181)
三、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183)
四、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	(187)
第三节 辩证法在战争中·····	(196)
一、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	(196)
二、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04)
三、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	(221)
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	(228)
简短的结论·····	(247)
第四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历史唯物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50)
第一节 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	
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251)
一、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251)
二、中国革命反映着世界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	(259)
三、无产阶级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	
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268)
第二节 根据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创立了	
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中国式的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	(272)
一、唯物辩证法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杰出运用·····	(273)
二、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287)
第三节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了	
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	(297)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298)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303)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305)

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法·····	(310)
第四节 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辩证法，阐明了	
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 ·····	(315)
一、量变质变规律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	
的哲学基础·····	(317)
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319)
三、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	(326)
简短的结论·····	(330)
第五章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	(333)
第一节 实事求是辩证唯物论思想	
路线的核心·····	(334)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	(334)
二、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337)
三、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调查研究·····	(340)
第二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 ·····	(343)
一、实事求是与唯物论·····	(344)
二、实事求是与辩证法·····	(347)
三、实事求是与认识论·····	(350)
第三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	(353)
一、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	(354)
二、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	(357)
三、实事求是与重点转移·····	(360)
简短的结论·····	(366)
结束语 ·····	(368)
后 记 ·····	(371)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果为基础的。”^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也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定历史时代需要的产物，是中国现代革命实践的产物，并且是以中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以中国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种种后果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9页

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就内容来说，还是就形式来说，都具有它自己的显著特点。这不仅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 产生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①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必须把握它产生的客观条件。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研究哲学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时代的特点。离开一定的时代，就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并确定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其特点是：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代，西欧的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怎样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做好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他们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总结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无产阶级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革命浪潮逐步高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如何实践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西欧的无产阶级走在革命的最前列，西欧成为革命中心的话，那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逐渐由西方移向东方，当时的俄国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成了革命的中心。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他揭示了资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赢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

代。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有的矛盾缓和了，有的矛盾激化了。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了。对此，列宁寄予无限的希望。他指出：“东方觉醒之后，现代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①他还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②毛泽东同志也说：十月革命后，“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③可见，十月革命后，时代给革命者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崭新的重大课题，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困难而又特殊的新课题。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④他接着说：“这

①《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①这是列宁对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党说的，同时也是对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说的。列宁认为，东方各民族不愿再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采取实际行动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时期到来了。

列宁、斯大林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革命，虽然有过许多很好的见解，但他们不是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直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也就不可能具体解决这个“特殊”而“崇高”的任务。因此，这个任务只能由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来实现。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提出的“崇高”的任务。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矛盾复杂的大国，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而又激烈尖锐的矛盾，成了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自从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你争我夺的一块肥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极为奇特的图景。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而又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幅矛盾交错的图景。他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05页

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①他紧接着指出：伴随着上述各种矛盾发展而来的，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反动政府和士兵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种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化。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就能知道当时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的状态，就能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全中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所有这些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正确地回答了时代提出来的新课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残酷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早在一八五〇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鸦片战争以后国际形势的论文中就明确指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殖民地化的加深，必然要引起中国人民的革命。他们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①一八五七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又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②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见。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夜，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连绵不断，一浪高于一浪。其中较大规模的就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革命运动和反抗斗争。从政治方面来说，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期间出现的三次革命高潮；从思想方面来说，主要经历了农民阶级平均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三种社会思潮。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加强。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虽然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但终究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走上独立、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它的伟大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4页

史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更日趋尖锐和激化；辛亥革命的失败，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不可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

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入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随着在官僚买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狗咬狗的战争，乱作一团无暇东顾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趁机发展起来，同时日本和美国在华的企业也迅速增长。民族工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共同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日益成长和壮大。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已约达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左右。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规模也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十一年中，罢工斗争共计有 105 次，而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的短短几年中，罢工斗争就达到 130 多次，罢工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特别是一九一六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工人成了这一斗争的主力，这说明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历史的发展，要求正在迅速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起来取代资产阶级担当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

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沙皇的皇冠被打落在地，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类

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这给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解放道路，从而使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让位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很快出现了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许多国家都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一九一八年初，芬兰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同年十一月，德、奥也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专制；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同年四月，德国巴伐利亚省也曾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罢工运动日益高涨；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着世界革命的基础。

在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为挽救祖国的危亡、民族的苦难，争取独立和解放，曾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企图仿效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们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民族危机一天天加深，祖国前途一天天危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了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那么，问题在哪里，出路在哪里？这是十月革命以前，始终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先进的中国人总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

结了许多次斗争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新的阶级力量，以指导和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十月革命向全世界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劳动大众要摆脱贫困和压迫，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要获得解放，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说：“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①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中，经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战斗威力。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形势。这一方面，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另一方面，加速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任何真正的哲学，它的产生和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新，除了为一定时代所规定和一定阶级利益所制约以外，还有其思想理论来源，有赖于对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的扬弃。诚然，对这些精神财富的批判与吸收、继承与发展，取决于时代的需要和阶级的利益，但如果不从一定的思想资料出发，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有它的理论来源：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二是对中国哲学优秀遗产的批判与改造。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一致的同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而决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另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因此，任何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极端荒谬的。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重复或机械的套用，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回答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增添了新内容。因此，任何想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贡献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在一九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九年“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开始运用唯物辩证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周恩来则在敌人的监狱里同难友们举行的讲演会上，系统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复蔡和森的信中更明确宣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可见，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相继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之后，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直至晚年，他还谆谆教育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学生。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③他一再指出：要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把唯物辩证法宇宙观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和应用在社会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上去。他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一百个到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① 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为全党作了表率，他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百忙中，十分重视学习、研究、运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延安，他发愤读书，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和其他哲学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② 毛泽东同志应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曾亲自去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讲授提纲分为三章。第一章讲唯心论与唯物论，阐述的内容有：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区别，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讲辩证法唯物论，阐述的方面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同过去哲学遗产的关系，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哲学对象问题，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第三章讲唯物辩证法，列举的方面有：对立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西行漫记》第67—68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同志准备写作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纲要。^①他曾说过：将来有可能，准备写一本“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可惜，这个宏伟志愿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不但自己发愤学习，还鼓励有学习能力的干部学哲学。住在杨家岭的一段时间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党、政、军干部学哲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以后，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倡议召开新哲学年会，并号召大家积极学习新哲学，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学习运动。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要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他特别强调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可见，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想到要创立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相反，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毛泽东同志忠实于马克思主义

^①参阅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第1辑，1979年8月

哲学，但他又不迷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而且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色。

（二）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批判与改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并不是说，它与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毫无关系。相反，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总结和继承中国文化遗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并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②他主张废除洋八股，唱空调，

“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③周恩来同志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④的确，毛泽东同志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等，都有相当精湛的造诣。这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就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从而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的民族形式、作风和气派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的哲学遗产是异常丰富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精神文明的民族，也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而且广。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不仅改造和吸收了中国哲学中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而且也批判地引用某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反证唯物论辩证法的正确，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关于朴素唯物论、认识论方面的改造运用。

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朴素唯物论的优良传统，从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孙武的唯物主义、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中经后期墨家、荀况、韩非、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陈亮、叶适、罗钦顺、王廷相，到集古典唯物主义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从未间断。毛泽东同志从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赋予崭新的意义。

在这里，最突出的事例，是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发挥，并加以具体运用。“实事求是”一语最早出于班固所著《汉书》。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做学问，广泛搜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把此语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其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这本是指“修学”的一种求实学风。毛泽东同志在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把“实事求是”提

到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高度，并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这一赋予新意的解释，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点用民族化的语言作了深刻的表述，而且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

我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论军事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也曾多次引用，并把它誉为“科学的真理”。孙武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是反映战争规律的朴素军事认识论思想。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可贵思想，进行了加工改造，深刻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②这就把战争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结合起来，揭示了战争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学习阶段，就是认识战争客观发展规律的阶段，即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战争的规律；使用阶段，就是自觉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实践的阶段，即由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任何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讲话和报告中，还引用了许多富于哲理的成语典故，来说明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诸如，引用《后汉书》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引用《论衡》的“闭目塞听”，来比喻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引用《沧浪诗话》的“一知半解”，来说明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而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引用《淮南子》的“削足适履”，来比喻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引用《宋史》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聪明的指挥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的措施，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等等。所有这些，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改造、引用，就都升华到了辩证唯物论的高度，读起来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亲切感人。

关于朴素辩证法方面的改造运用。

中国古典哲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极其丰富多采的。从古代的《周易》、《孙子》、《老子》，中经韩非、杨雄、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叶适、方以智，到集古典辩证法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从未中断过。毛泽东同志也从中吸收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使其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天才地猜测到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并看到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

《周易》，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算卦（“卜筮”）的书。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易经》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抽象概括为阴阳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是一切具体事物共同具有两种对

立的势力。它认为，阴阳互相交感产生万物，并推动着事物由低到高的变化发展。这种概括，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我国《易经》思想时曾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①后来，《易传》对《易经》的思想进一步作了解释和发挥。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它把阴阳相互作用（交配、交合、交接）看作是一切事物形成、变化和转化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对立时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②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阐释，就把古代的阴阳学说同辩证法的两点论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孙子兵法》，是孙武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它是一部论战争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它在中外军事史和哲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译成法、英、德、日、俄等国文字，广泛流传。孙武认为，指导战争必须做到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他要求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天时、地利、将帅、士兵等方面，做出详尽的了解和全面的分析。他还主张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促使矛盾的转化。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对立的范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畴，比如敌我、主客、治乱、强弱、众寡、分合、攻守、进退、久速、曲直、劳佚、奇正、勇怯、虚实、动静等，并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了一整套朴素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但也不能否认其中吸收了孙子等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除了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以外，毛泽东同志还引用《孙子》中不少合乎辩证法的论断运用于战争，比如引用“以逸待劳”，来说明以养精蓄锐的部队，去对付奔走疲劳之敌；引用“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来说明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然后给予打击；引用“示形”之类的方法，来制造虚假的现象以迷惑敌人，即所谓声东击西；引用“出其不意”，来说明在敌人处于毫无准备和料想不到的时候进行攻击，等等，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老子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重要著作。老子看到了许多对立的事物和概念，都是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的。比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明暗、白黑、进退、胜败、攻守、得失、巧拙、奇正、善恶、强弱、兴废、曲直、多少、大小、祸福、生死等等。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又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异），善复为妖（灾）。”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极为宝贵的，它对人类的认识 and 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老子对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都看作是无条件的，自然而然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说明。毛泽东同志改造和吸收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讲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的

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①这就明确指出了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他还引用《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思想，来说明战争中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只有暂时的丧失才能换来永久不丧失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深刻阐明了对立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除了总结实践经验以外，无疑也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合理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还广泛引用许多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名言，并加以改造和吸收。他引用《汉书》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并说明在战争中保存自己和勇敢牺牲，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他引用《鹖冠子》的“物极必反”，来说明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引用《史记》的“因势利导”，来说明只有根据事物发展的趋势加以引导，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引用《汉书》的“犬牙交错”，来形容矛盾错综复杂的状况；他引用《资治通鉴》所载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说明要全面地看问题，切忌主观片面性；他引用《鹖冠子》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来比喻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他引用《汉书》的“后发制人”，来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先退让一步，保存军力，创造条件去歼灭敌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扬弃，都加进了崭新的内容，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古代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朴素辩证法思想大放异彩。

综上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必须指出，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这种联系，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看成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那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虽然，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长过程中，蕴藏着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以后，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化、民族化形式的统一，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所以它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喜爱，并容易掌握、理解和运用，成为革命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形成发展过程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反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斗争中，并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它开始萌芽和初步形成于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已经系统化和完全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但在一段时间里曾走过曲折的道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就能比较完整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就能比较系统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就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就能在新的革命征途中自觉地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

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又可区分为一九二七年以前和以后两个阶段。

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是党的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党的幼年时期。他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

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这就指明了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一是，革命的实践经验非常缺乏；二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但是，它在中国革命的沃土上已经开始萌芽了。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②我们党一诞生就开始了这个“日益结合”的过程，也就开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源泉，必须用革命手段清除列强在华特权，肃清军阀势力，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同年七月，党的“二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走。党的最低纲领是：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中国近代史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3页

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这个纲领，主要是依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制定出来的，但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回答中国革命提出来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重要表现。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机会主义观点，表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他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从不同的方面否定或架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它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观点，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区分敌、友、我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制定党的正确路线，因此我们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而在党的“四大”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批评了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观点。邓中夏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文中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

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当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作。文章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又一重要表现。

（三）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②在我党幼年时期，在农民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从不同的两个极端否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北伐战争前夕，一九二六年二月我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从这时开始，我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和发动，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彭湃等都一再著文阐述农民运动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训练农民运动骨干。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

①邓中夏：《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1924年11月《中国工人》第2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8页

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同志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指责和攻击，亲自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当时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他根据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论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由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分析，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出发，指出了对待群众运动的三种态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问题。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阐发。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主要表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取消农民自卫武装，大批捕杀工农领袖和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彭湃同志领导海陆丰农民自卫军，于五月一日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并上山打游击战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创了在我党领导下举行农民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同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保存农民自卫武装，“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认为，保存武力最好的办法是

“上山”，而且“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些实践和理论，为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综上所述，在这期间里，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始结合，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在哲学上作出了一些概括和总结。但由于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而只是有了重要的萌芽。

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我们党懂得了组织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紧紧依靠农民，开展武装割据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二百多次的武装起义。在党的号召下，我党有一大批中坚分子由城市奔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党的骨干力量上山下乡，就没有中国的红色政权和红色政权的理论。正是大规模的革命实践，为迅速找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在这基础上，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同志认真总结经验，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三〇年五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陈毅同志曾说：“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

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在战争环境中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国内外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政治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最杰出的创造和发展。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不仅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特别是矛盾分析观点的创造性运用，而且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二）正确地提出了建党建军的原则，初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三湾进行了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从三湾

^①转引自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第1辑，第33页，1978年8月

改编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同志为建设新型的政党和新型的军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红四军召开“九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全文共四十页，分九个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奠定了我军的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和资产阶级建军思想的界限。早在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就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此后，逐步制定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为我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作出了贡献。

（三）尖锐地揭露了本本主义的错误，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实践斗争经验，从哲学上作了概括，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叫《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斗争的哲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首先，它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并进一步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其次，它首次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同时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思想路线。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这表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中所作出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党创造性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揭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提出了一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这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但还没有系统化，这就有待于革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并从中进一步作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时期

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的重要时期。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在这一段时期里，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全面展开，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在政治上，我们党犯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犯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军事上，我军经历了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推行了一条先是军事冒险主义，继而是军事保守主义，最后是军事逃跑主义的路线；在哲学上，德波林的唯心论在我们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这种“左”的错误倾向的主要特征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得照办，凡是苏联的经验就得照搬。这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通过王明为代表来贯彻执行的。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形成并有了发展，逐步达到了系统化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了国内外的新的矛盾和问题，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革命的不同阶段，这种

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因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中国人民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地下降为次要矛盾；他具体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指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批评了那种“左”倾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他依据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对地主买办阶级内部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要善于利用和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他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及危害性，同时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为了纠正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就需要清算过去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②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思想。这是反对本本主义斗争的继续，也是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先导。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形势、矛盾的辩证分析，为党在新时期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从而对党的政治策略作了最完整的分析，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二）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推广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运用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战争中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指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阐述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系统的发挥。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论文，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篇著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划清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思想路线的界线，它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

上述表明，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时期。同前一时期相比，它的内容更充实、更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也反映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完全成熟时期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到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期。这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新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活跃、最生动的新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容最丰富多采的时期，因而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经过革命实践检验得到充分证实，并运用它再去指导革命活动的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发展的总的特点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更系统更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其主要之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就是在这个时期系统化、完整化的。经过这个时期的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

思想是科学真理，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同时考虑到各国矛盾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独立地观察和处理所面临的问题，因而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对此，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并正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 and 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已经完全成熟。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指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反对唯心论宣传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在“七大”会上，刘

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评价，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揭示了战争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和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战争中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指明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又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战略进攻学说，制定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人民战争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了充实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完整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阐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批判了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中，创立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是共产党人如何把科学方法运用于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他所阐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以及整顿三风的文献中，而且更体现在专门论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

法的著作中。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说：“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初步形成了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党领导的工作经验，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又先后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工作方法十六条》，一再指出必须重视科学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基本的方法，有具体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等等。具体方法有：“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波浪式前进等等。毛泽东同志创立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加广阔和现实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综上所述，在这十二年里，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发展，斗争不断深入，我党的革命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这不能不反映在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中。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更深刻、更完整，在体系上更严谨、更系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光辉发展的时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四月，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光辉发展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去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解决新任务。

这个时期，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引下，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进一步得到了光辉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地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党在过渡时期的许多方针政策，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

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已经提出。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时，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我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生产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把个体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把个体生产者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者，这是我党对小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极其辉煌的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的杰出运用。

我们党又正确解决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采用“和平赎买”的方针，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创造性运用。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的基本完成，就使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从而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二）通过调查研究，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经济

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春天，先是刘少奇同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在两个月时间内，亲自听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运输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他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十大关系，是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提出的。这十大关系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一新内容。

（三）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的原理还灵不

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完全适合，而没有矛盾？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作出科学的回答，否则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有些人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早在五十年代以前，苏联的党政领导人就断定社会主义已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只有统一，只有差别。后来，苏联的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是“和谐的”辩证法，“矛盾不再具有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斗争的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下“辩证的对立、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他们忌讳“对立面”的概念，主张抛弃“统一物区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旧公式”，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改为“差别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毛泽东同志针对国际上这种公然抹煞矛盾，反对辩证法鼓吹形而上学的思潮，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确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具体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从而科学地回答了时代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重要的新贡献、新发展。

总之，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这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财富，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

一九五七年四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曲折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里，又可以区分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哲学思想中，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两部分，二者往往交错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把正确和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在晚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增添了不少光彩夺目的、新的颗粒；同时，在他的言论中也存在着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错误论断。然而，即使当他犯错误的时候，他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还始终坚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正是他晚年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增添的新内容，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这些思想，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一九六〇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他所作的《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

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①他以民主革命为例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②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③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总结，也是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生动而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②，③同上，第18—19页，第27页

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又反对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错误倾向，同时指出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反复的过程。这就丰富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思想。

（二）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的新论断。

毛泽东同志上述的新论断，是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文字虽然简短，还不足一千一百字，但思想容量很大、很丰富。它指出了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个飞跃；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指明了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的重要性，等等。总之，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也揭示了人们认识运动的分过程，从而把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

^①转引《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实践之间的矛盾辩证途径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来了，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三）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事先同陈伯达密谋炮制了一份“称天才”的材料，竭力鼓吹天才论。毛泽东同志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这表明，毛泽东同志在天才问题上，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坚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把认识论中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历史观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深化，也是对《实践论》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的深入和发展。

（四）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这是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的光辉范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同志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准确地把握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确立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两种矛盾、三种力量和中间地带的理论。进入六十年代，

国际政治力量、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变化。到了一九七四年二月，他完整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为国际反霸斗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注意。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战斗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的结果。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同志作为无产阶级伟大战略家的大智大勇、科学精神和革命气概。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严重的失误和错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经济情况认识不足，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加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急于求成的愿望，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道路上，遭到了曲折，招致了严重失误，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实践表明，在这一时期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

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一生都倡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并在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错误思想路线斗争中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哲学思想的人，在晚年竟然陷入了主观主义，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呢？应当指出，在理论上，毛泽东同志还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一个起码的唯物主义前提；但在实践上，却往往从美好的理想出发，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违反客观实际的估量，结果导致在政治上犯左的错误。因此，从世界观上来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是以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范畴，所以本文就不作具体评述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确地分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的。党的《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个新时

期中，我们党在实践中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向前进，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

（一）重新确立了党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

党的历史表明，凡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以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为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发展；而背离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就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五十年代后期发生的左倾冒进带来的失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混淆是非以致混淆敌我的错误，都是背离了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因此，党的三中全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上，是完全正确的，是至关重要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方针。这就把思想路线的解决，提高到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这样，就不仅恢复而且进一步发挥了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

（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即：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决议》指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三）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

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决议》中总结了十条。这十条的基本思想是：它指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正确途径。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必须准确地估量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第四，必须逐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等。这十条要点，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找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道路。

以上概述，说明了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增添了新的颗粒。胡耀邦同志说：“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①事实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党中央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决议》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范例，也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新的结晶。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不断开放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历史发展形成的，它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阐明它。这里既要反对过分夸大，又要反对任意贬低，而应当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去作出科学的评价。

要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必须遵循继承和发展、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

^①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页

要贡献。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基本理论方面说，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等方面，都有不少重要的贡献和发展；从实际运用方面说，它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推广应用于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和实际工作，创造性地阐述了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等等，从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呢？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主要不是指表现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主要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中国化了的基本内容。这种特点，不仅为具体的历史时代所规定，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

一、从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上，充分发挥了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们从来就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体系。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致力于哲学的研究，是为了创立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精神武器，指出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批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篡改和修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先后批判过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过资产阶级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机械唯物论、庸俗进化论以及新康德主义等等。而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先后批判过俄国的主观社会学、马赫主义、第二国际的庸俗进化论、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等等。但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所批判对象的共同点,主要是以公开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此,根据思想论敌的特点,他们主要是从理论形态上粉碎他们的奇谈怪论,而且在批判时主要也是联系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来进行的。他们主要是以总结这方面的科学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工人运动中,在共产党内,再以公开的露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已不再仅仅在理论领域,而且进一步深入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因此,问题不在于理论上或口头上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主要是在实践上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中国革命实践表明,在我们党内无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理论上或口头上都承认唯物论和辩证法;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唯物主义前提。但在实践活动中却往往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不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结果导致在政治路线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所以,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所碰到的思想论敌,虽然也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公开宣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但在革命内部和党内却主要是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哲

学上所批判的对象主要不是以学术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世界观上去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

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而在稍后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表现形式的本本主义。他强调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②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的原则，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从实际出发和从本本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斗争，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和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党内哲学斗争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并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所以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活动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1页

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

二、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地论证了 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创始人，把认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但他们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没有着重论述认识论问题，没有来得及写出系统地论述认识论的专著。虽然，他们在理论研究中，提出了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指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必须把认识的能动性应用于反映论，即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指出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等等。但对这一系列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未能做出深入地系统地具体阐明。

列宁所处的时代，认识论成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焦点。当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其目标集中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他们叫嚷要以康德认识论、马赫认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列宁以最大的勇气迎接了敌人的挑战，在百忙中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他阐明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两条认识路线基本区别。他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提出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②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著名论断，等等。但是，由于列宁所面临的论敌的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主要是唯心论的哲学倾向，所以他当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的基础上。他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辩证途径，都未来得及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充分地系统地展开论述。这就为以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提出了系统化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直接完成了列宁所提出而未完成的任务。这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同志坚持实践论，反对先验论，不是从一般地宣传、讲解认识论原理出发，而是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突出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以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为中心，全面展开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系统论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全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实践论》虽然篇幅不大，但它是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后来，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深刻地阐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辩证法，从而系统地完整地论述和发展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上，集中地论述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研究了科学发展史、思想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了旧哲学

的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而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哲学上引起了巨大的革命。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着重研究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指出了辩证法的研究对象，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本质特征，提出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等问题。为了通俗地讲解辩证法，马克思1858年1月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说：如果有机会，他打算写一本“使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辩证法专著。^①虽然马克思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他们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石上，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使辩证法成为科学的世界观。

列宁所处的时代，世界各种矛盾全面激化，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大动荡、大转化的时期，因而各种矛盾具有多方面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列宁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注意研究辩证法。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他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一步总结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深入地分析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写下了《哲学笔记》这一光辉文献。列宁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应用于认识过程和发展，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列宁对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作了初步的说明和发挥，但毕竟是纲要式的短文，未能从完整的理论形态上系统地加以论述。根据列宁写作《哲学笔记》来看，他有一个写作辩证法专著的宏伟计划，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繁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

的工作，致使《哲学笔记》成为列宁未完成的辩证法论著的宝贵遗产。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各种纷纭复杂相互交错的矛盾，其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是世界所罕见的，使中国成了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这种客观世界复杂的矛盾运动必然要在哲学上反映出来。但在这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总体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捉住其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碰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就决定了矛盾学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撰写《矛盾论》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它是列宁《哲学笔记》中辩证法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专著。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他不是一般地从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理论出发，而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紧紧抓住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系统而完整地展开论述。尤其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阐发，从而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更加理论化和深刻化，并作出了新的贡献。

当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际上形而上学思潮泛滥，鼓吹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否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同志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思想，反复教育全党要照辩证法办事，要用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的新问题，观察和分析国际斗争中的新矛盾，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期实践斗争中，还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系，使辩证法广泛地普及于群众之中，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这一体系表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家；它还表明，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四、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阐明了以 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引起了哲学的革命变革。恩格斯说：“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①他还指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产生，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社会历史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注意力是反对各种唯心史观，阐明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因而着重于经济的研究。他们一再指出：物质资料和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变革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点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②他还说：“我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显然，他们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强调得不够。为此，恩格斯还做了自我批评，但同时指出：在“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②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日益滋长起来，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唯物历史观，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也乘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庸俗化，把它歪曲成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等等。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唯物主义当作公式、标签到处生搬硬套。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了新的论述：第一，既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指出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其他各种因素；第二，既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又指出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有巨大影响，并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第三，还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从而彻底粉碎了德国的反动社会学者保尔·巴尔特之流的攻击，同时也批评了德国党内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这样，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中，既坚持了唯物论，反对了唯心论；又坚持了辩证法，避免了形而上学。

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挥了恩格斯的思想，他在《矛盾论》中，批判了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并对“一定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紧接着他又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这显然在恩格斯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表达得更明确、更彻底，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这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而贯彻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主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谱写了新的一页。

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研究军事科学，对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作出了崭新的贡献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创始人，他既有直接的实践经验，又有专门的军事知识和理论素养。他在先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评论和军事论文，从理论上概括了近代战争的许多重要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他在军事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军队的起源、阶级本质及其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各种兵种的组织和建设的历史；分析了战略战术的发展史；分析了军队教育和训练制度的历史；分析了杰出将领在战争和军事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的历史；分析了各种武器发明和发展的历史等等。总之，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丰富多采的。但恩格斯特别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军事规律和军事原则，如敌我双方的情况及其变化、作战条件的具体情况、各个兵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各种军事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战略战术的相互配合和相互影响等等。这说明，恩格斯在军事科学领域里，既坚持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总结了战争的经验，揭示了战争的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不同性质战争的态度，揭示了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革命战争夺取无产阶级革命

胜利的途径，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内在联系，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总根源。他在战争转化问题上，既反对了奢谈战争转化为幌子，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也反对了否认战争转化可能性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过激倾向，正确分析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形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进行长期的、持久的革命战争，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阐明了革命战争的辩证法，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作出了最系统、最完整的贡献。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与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重要文献。它不仅是一篇著名的军事著作，而且也是活生生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已经孕育着一年后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思想。它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篇。可以说，它是论战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是运用

唯物辩证法揭示战争发展规律，批判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杰作。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根本规律，揭露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充分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活生生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说《论持久战》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续篇，同样，也是论战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的形势和规模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也反映了一般人民战争的普遍规律；它虽然文字简短，但却系统地阐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并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揭示了战斗中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指出要从发展观点看问题，阐明了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质变与量变、根据与条件的辩证关系。总之，它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行动纲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新贡献、新发展。

此外，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发出的指示、电报、通讯、命令、通知和评论等等，都体现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关于毛泽东军事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我们将在后面专章论述。

总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的体系，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典范，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离不开《资本论》的话，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则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学的典范，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同样地也离不开研究这些重要文献。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它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的一页。

六、致力于哲学的解放和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时也说：“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毕生都致力于把哲学变为无产阶级手中的锐利武器。但是，应当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还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还被反动当局视为毒草和异端，受到排挤、打击。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它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传播，根本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普及。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道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反复阐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一再号召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也是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在全国人民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看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他说：“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①“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②

在一九五七年，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多次号召全党按辩证法办事，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同年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③

在一九六三年，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144—14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①他再次发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伟大号召。他强调搞哲学不要搞旧式的思辨哲学，书本哲学，而要搞实际的哲学，群众的哲学。可见，致力于哲学的解放，也就是要哲学的群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深入地和群众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必然。

为了哲学的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许多谈话和文件里，经常地、反复地讲哲学。他亲自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运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实践，指导自己的工作，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哲学的解放，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将成为哲学的世界”的预言，在中国将逐步成为现实。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最主要的代表，它在一系列基本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夸呢？不是。这是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除了它的敌人以外，为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请看事实：

苏共中央《真理报》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题为《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还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①

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一年第74期（中文版）上，发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文中说：毛泽东的这篇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中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它是在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瞭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列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②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6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和主要的理论著作，明确指出：“毛

①《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②《新华月报》1951年3月

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宝库的丰富，对于一切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理论和实际的益处。”

一九五五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①

一九五八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多处引用毛泽东的言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教科书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卓越贡献。”^②

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理论家都纷纷撰文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指导意义。有的马列主义政党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帮助奠定了我们运动的思想基础”。有的说《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他们党的教科书。亚非拉美的一些思想家和理论家也认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他“丰富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评论分析人类历史、政治和社会大事的可靠准则。”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新华社编译的《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一书中，选编了世界各国各界人士悼念毛泽东同志的声明、谈话、诗歌、回忆、文章和报刊评论，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随处可见。虽然，有些评价不尽恰当，但它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人民

①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资产阶级比较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富有特色的理论。美国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各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西德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还说：“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这篇导言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实质。”

可是，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理论家们一反常态，为了适应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又是发表文章，又是炮制小册子，连篇累牍地放肆地歪曲、贬低、抵毁和攻击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正如法国的一位学者所说的，这些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到昨天为止还占有光荣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统统删去。”^①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当代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国际共产主义杰出的活动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实践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①米歇尔·卢瓦：《〈实践论〉法文版前言》1973年巴黎，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

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是为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简短的结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定时代产生一定时代的哲学。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该时代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产物，它既是群众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人类哲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而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

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①还说：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②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它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劳动的丰硕之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它既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否定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关系，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是完全错误的；反之，否定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仅仅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照搬照抄，也是极端错误的。毛泽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5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页

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的产生是对旧哲学的根本否定，标志着旧哲学的终结。但它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过程中，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积极的东西，批判地改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是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的真正继承者。但是这种继承并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批判旧文化，同旧文化决裂的过程。因此，看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同过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关系是不正确的，而混淆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旧哲学的界限则是更加错误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是在同党内的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作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并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

第二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 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两篇哲学专著。这两篇著作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全面地阐明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珍贵财富。

综观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理论化系统化的标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代表作。几十年来，这两篇著作一直是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教材，反对和防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错误的有力武器，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实际工作的指导上曾经发生过十分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重新来学习和研究这两篇著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胜利地开展今后的工作，加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修养，更是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实践论》、《矛盾论》

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实践论》、《矛盾论》产生于一九三七年七、八月

间，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既不是毛泽东同志头脑里所固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长期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和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合乎逻辑的发展。

一、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物

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党已经走过了十六年的战斗历程，这中间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两个大的阶段。我们党经受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逐步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对这种规律性认识和独特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同时也是为了清算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不仅需要有一个巩固的组织，而且需要有正确的路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线不可能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而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即是党，如果不同那些危害革命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这十六年中，党内曾经几次出现过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北伐战争后期，党内曾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搞投降主义，致使轰轰烈烈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

无论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它们共同的思想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党内的主观主义通常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根本原则。他们不了解不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一切从书本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宗教教条，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党内发号施令。在党的工作指导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一次革命论”；否认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主张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在军事上，进攻时搞冒险主义，防御时搞保守主义，退却时搞逃跑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实行唯物辩证的战略战术的思想。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总之，“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①王明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以及组织上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

党内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不同，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它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而醉心于局部的经验，把局部的、片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把它们当作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经验主义往往成为它的助手。

教条主义是当时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一方面教条主义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与这种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解决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引导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中，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都是和思想路线紧密联系的，归根到底都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就是一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要彻底批判和防止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并肃清其流毒，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武装全党。《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哲学基础的。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结果

列宁曾经指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

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同样地，由于中国国情不同于西方，它所进行的革命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进行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独立地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在探讨这一理论时，却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原因之一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流行过一种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和把别国经验教条化的幼稚病，而这种幼稚病的流行又是与共产国际中某些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的错误有直接的关系。

应当肯定，共产国际曾经对于各国革命是作过贡献的，特别是对于中国革命曾经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共产国际传达的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革命的指示给予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思想武装。共产国际几次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也给中国革命以许多正确的和及时的原则指示。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毕竟不了解中国的实情，不可避免地作出一些错误指示，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属于上下级关系，中国党是共产国际中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甚至派驻中国党的代表们的意见都带有强制命令性。这种包办代替式的领导方法不仅阻挠和压抑了中国同志放手大胆地进行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而且也培养和助长了一些人的懒汉作风，即自己不调查，不动脑筋，而热衷于照抄、照搬的作风。陈独秀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和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党的代表的右倾有关。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由于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采取的包办代替式的方法有所改变。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就曾经意识到并尖锐地批评过这种领导者，他说：“尽管我们党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领导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公认的一般原理，不用顾到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文化、中国习俗和传统的民族特点，所谓用电报就能领导中国革命。”^①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驻中国代表，而在此之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寥寥无几，而且为时甚短，有的未起作用。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使我们党获得了一段时间的活动自由，促使了自己去独立地提出任务，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独立地开展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独特经验，再用这些独特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形成带有自己特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标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创立和以《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就是这种独立进行实践和独立研究理论的产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的根本思想；提出了

①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见《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74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0页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的重要原则；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②等著名论断。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一时不仅不被一些坚持错误思想的中国同志所认识，而且也不为习惯于包办代替的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接受。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统治我们党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后台和靠山就在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米夫的导演下，借批判立三路线之机，让王明一伙人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在共产国际派来的所谓军事顾问李德的全权领导下，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和长征初期的巨大挫折。

共产国际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下决心改变这种错误的领导方法，是在一九三五年之后。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二十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了它的“左”倾政策，号召建立人民阵线和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共产国际“七大”决定，由各国党的领导者“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组织上的事宜”。这在共产国际与各国党、特别是与中国党的关系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条件，使我们党能够独立地领导了胜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结束以后能够独立地开展了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有步骤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同时也独立地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向开展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创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这种独立研究和创造的结果。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4页

②同上，第17页

当然，这种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向来不把革命遭受失败的原因全推到共产国际身上。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还曾经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

而且，这种独立性更不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而是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不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同时代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同马克思、列宁一样非常善于广泛地利用已有的思想资料（包括先驱者的和同时代人的）作为自己理论研究和创造的前提。毛泽东同志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时，除了学习和引用当时已翻译和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外，还吸收了苏联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所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

三、它是指导新时期伟大斗争和端正全党 思想路线的需要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生也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一个历史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相联系的。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表现得异常尖锐和复杂，斗争形势变得异常残酷和艰难。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取得对于中

^①《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1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国社会矛盾的清醒认识，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以赢得革命的胜利，就需要进一步端正全党的思想路线。《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写的。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表现得最突出、最尖锐的是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而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降为次要的地位，同时又扩大了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激烈和复杂。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奇特的交错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当时的主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必须灵活地处理统一战线内部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根据不同的对象，实行不同的联合，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既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两种错误倾向。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差不多把中国革命长期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而曲折的矛盾运动都集中起来了。为了指导伟大的抗日战争，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去认真研究矛盾运动诸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新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第二节 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研究主观同客观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学说。列宁指出：“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①即是说，认识的本质就是主观对客观事物矛盾的全面、深刻的反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以社会实践为中心，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认识过程的矛盾运动，从而深刻地阐述了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客观基础，系统地论证了主客观矛盾统一的辩证途径，全面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②虽然这种明确的表述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的，但是这种思想，在《实践论》中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说明。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625页

(一)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括充分表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本质特征。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不仅反对唯心论的认识论，而且和旧唯物论的认识论也有原则的区别。一切唯物论的认识论都是反映论，都承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外界的反映，这是一切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首要前提。但是，只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因为，只有承认反映论，同时又承认主观对客观的巨大能动性，才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如果划不清这个界限，就不能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批判费尔巴哈，就不能认识“哲学革命”的核心问题和本质意义。可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科学的规定的革命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克服了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缺陷，创立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在其“具有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对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开展了批判，指出他们的反映论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不认识“能动的方面”，“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列宁在批判旧唯物论的反映论问题上，“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旧唯物论的反映论之所以没有能动性和革命性，就因为他们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②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的思想和列宁的发挥继承下来，并针对旧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根本缺陷，把辩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唯物论的认识论学说，创造性地规定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所以是能动的，就是说不是直观的、照像式的反映，而是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辩证的反映；所以是革命的，就是说不是消极的适应环境，而是革命的改造世界。这充分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性和革命性，表现了认识辩证法的本质特征，所以它是一个科学的规定。讲反映论而忘记这一点，就必然滑入形而上学的泥坑。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极为重要的见解。

（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括突出体现了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后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一再阐明了这一基本思想，并把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

列宁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指出：“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②他又说：“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③可见，列宁同样把反映论同历史唯物论紧密地联系起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括也突出体现在历史唯物论当中。他在《实践论》的一开头就是从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来批判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①这也就把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统一起来了。因为，“人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所以，只有在“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人的意识和客观存在的关系。在这里，人们在社会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下面，进行着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通过实践而认识世界，达到意识能动地反映客观存在，即从“物质到精神”；而革命的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在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中发挥组织、动员和指导的作用，即从“精神到物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征。由于把认识论提到历史唯物论的领域加以阐述，这就更加证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括的正确性。

（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括强调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

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点，提出了主观对客观、思维对存在具有巨大反作用的思想。在谈到人和动物的质的区别时，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②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还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以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一贯坚持的正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依据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在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下，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意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巨大的反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全面论述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把上面所提到的“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概括为“自觉的能动性”。^⑤他在《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反复提到和阐明的“认识的能动作用”、“能动地改造世界”、“主观能动的作用”、“能动地飞跃”等等提法，就是指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面互相转化的理论，深入探讨了尊重客观事物、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系，科学地阐明了精神、理论等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伟大思想，进一步充实了关于自觉的能动性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所具有的能动性和革命性。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这里讲的“一定条件”是：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当着革命的运动需要革命的理论作指导的时候；当着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在这些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革命理论的创立、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这是不是违反唯物论呢？毛泽东同志认为：“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

毛泽东同志不仅论证了自觉能动性的伟大作用，而且通过对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途径。除《实践论》、《矛盾论》而外，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著作，都是根据客观的历史辩证法，启发和引导正确发挥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伟大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篇章，是对人民群众自觉的能动性的伟大颂歌。

二、实践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主观是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主客观矛盾是能够达到统一的，而达到统一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实践。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就是说，离开了实践也就谈不上主客观矛盾的统一，就谈不到正确认识的形成。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作了系统的、详尽的说明。他深刻地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②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and 支配作用。

（一）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列宁曾多次提到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指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③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点，当然也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126页

基石。但是，列宁的这一说法主要是从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的角度作出的。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往一切旧认识论（包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区分开来的角度，在肯定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泉源这个基本前提下，提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人的认识究竟怎样才能发生，怎样才能从客观实在获得感觉经验的问题。

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认识的主体就无所谓认识；如果没有认识的客体就无从认识。但是，只有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还是无法获得认识，这中间必须有联系主体和客体的纽带、桥梁，这个纽带、桥梁就是实践。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这个环节，才能解决主客观的矛盾，才能把客观物质世界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①又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②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基本实践对人的认识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认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中的三大基本实践，并且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③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③《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首先，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②其次，毛泽东同志又论述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他指出：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③再次，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基础上产生并又为它们服务的科学实验，也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内容之一，同样也是人们认识的来源。他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④这就是说，科学实验也是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一个基本实践，没有这个实践，就没有科学理论。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还科学地提出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概念，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种种片面性。他一方面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⑤另一方面又指出：“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26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间接经验的东西”。^①“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②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既反对了那种否认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又批判了那种忽视直接经验、反对实践第一的错误思想。他在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③这就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二）阐明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关于认识发展的动力问题，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写的《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他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⑤这就是说，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量。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等著作中谈到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由于人们的实践的深入发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对人们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也正是在新的实践的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基础上产生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同志说：“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①

第二，认识的深度随着实践的规模增大和实践手段的提高而发展。毛泽东同志以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为例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②这个问题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突出。后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制造和改革“认识工具”对推动认识发展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认识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也就逐渐深入。^③这是对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的新的说明。

第三，“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2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③《一九六四年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参见周培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怀念毛泽东同志》一书

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①即是说，认识的无限性决定于实践的无限性。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实践和认识的矛盾发展，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实践的不断发展，不断打破人们认识上的旧框框，引起认识的不断发展。

（三）论述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

关于认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②恩格斯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③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④又说过：“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⑤

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他不仅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而且说明是唯一的标准。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⑥“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⑤《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办法。”^①就是说，认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毛泽东同志不仅指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而且进一步论述了实践为什么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他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③又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理由就在这个地方。”^④

关于检验认识的标准，列宁曾经提出了一个实践标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他说：“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⑤所谓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说的是一切认识、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判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所谓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说的是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驳倒一切认识、思想和理论。但是，必须指出，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一点讲，它又是绝对的、确定的。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毛泽东同志深刻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并且阐明了它为什么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他指出：“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①这就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一方面实践对一个认识的证实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即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②另一方面，一个认识的正确或错误，终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成功或失败的检验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践，尊重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具有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

（四）指明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天起，就把哲学不仅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武器，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就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列宁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④马克思、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单行本，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④《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但是，他们的这些思想都是以笔记的形式记录的，还有待于展开和发挥。这就为后继者提出了任务，毛泽东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在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强调：“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①从而进一步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据此，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③教条主义者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但不去应用或者说不会应用，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因而，我们就不应当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④

三、两个飞跃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辩证途径

主客观的矛盾是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统一的，即是说，主观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的，人们是可以通过实践获得认识、发展认识、检验认识和实现认识的目的。那么，主客观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

矛盾是怎样在实践的基础上趋向统一的呢？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呢？这就要研究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就要研究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具体运动过程。

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的原理，恩格斯早在一八八二年就做过原则的论述。他说：认识是“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①列宁在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斗争中也明确地指出：“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識。”^②在《哲学笔记》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③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又具体阐发了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中产生、又回到实践中去的辩证途径，并把这一辩证途径表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样两个飞跃的阶段。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进一步把这一辩证途径科学而通俗地概括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两个飞跃，并深刻地分析了两个飞跃的各个步骤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重大作用。

（一）关于第一个飞跃。

①《自然辩证法》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第一个飞跃就是指由实践到认识的飞跃，即由客观的物质到主观的精神的飞跃，由存在到思想的飞跃。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一飞跃的过程，科学地提出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理论，并把它概括为物质变精神。

什么叫物质变精神呢？毛泽东同志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①这就深刻地说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说明了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他还揭示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把认识论、唯物论、辩证法高度地统一起来。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它们是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理性认识同感性认识相比，不但有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同志指出：“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②因此，我们决不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能把它们混淆起来，否则就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犯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毛泽东同志说：不论是感性阶段，还是理性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①这就是说，这两个阶段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在分析了感性和理性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深刻地阐明了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②

为什么“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的反映。理性认识之所以靠得住，正是因为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认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了。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③因此，结论是“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④毛泽东同志正是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把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同认识依赖于实践，主观决定于客观，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高度统一起来了。

为什么“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客观事物存在着现象的方面和本质的方面，外部的联系和内部的联系。感性认识只解决现象问题，它仅仅是事物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反映；而理性认识才解决本质问题，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此，感性认识必须跃进到理性认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识。理性认识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超出了感性经验的范围，把握了事物的规律，形成了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又会加深对于事物的感性认识。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这个辩证关系，他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并进一步指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②毛泽东同志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并把它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根本途径，并把它运用到革命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去，提出了调查研究是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经过头脑加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获得正确的思想；一是经过头脑加工，歪曲了事物的本质，产生了错误的理论。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前一种可能性而避免后一种可能性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理性认识是以感性材料的大量积累为基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理论的方案需要经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③正如列宁指出：

“《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认为，理性认识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能动加工、综合。恩格斯说：“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③《资本论》第1卷，第417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绝对不同的印象。……我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①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把客观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的过程，高度地概括为两个步骤、两个基本条件。

两个步骤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②

两个基本条件是什么？第一，“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③即是说，占有充分的和真实的感性材料，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④即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科学的抽象，才能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恩格斯所说的“加工”、“综合”发展为精辟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个字，深刻地阐明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科学地揭示了人们思维运动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还把第一个飞跃的原理具体地应用到革命实际工作中去，提出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多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⑤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3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是向社会作调查”。^①调查阶段就是人们的感性认识阶段。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具体情况，以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依据。如果仅有调查而无研究，那么人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不能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因此，必须有一个研究的阶段，即分析综合的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还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上揭露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他深刻指出，教条主义者重复了哲学史上“唯理论”的错误，把理性认识绝对化，看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主义者则重复了“经验论”的错误，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两者都是片面的，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克服这两种错误的办法就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样把经验和理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起来。这样，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第一个飞跃的基本原理。

（二）关于第二个飞跃。

第二个飞跃就是指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也就是用理论指导实践，把精神力量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第二个飞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反复性和曲折性以及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根本途径。

第一，毛泽东同志强调了第二个飞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他后来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②为什么第二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呢？“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③同时也因为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即“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强调第二个飞跃，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第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第二个飞跃的反复性、曲折性。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说：“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④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⑤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②③《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271页

⑤《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毛泽东同志关于第二个飞跃的反复性、曲折性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

第三，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根本途径。

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要经过哪些必要的环节，过去研究较少。黑格尔认为理性认识要通过目的性的范畴才能到达于实践。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列宁对此很赞赏，但没有来得及发挥。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根本途径和必要环节。他根据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进一步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③这就是说，要实现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即实现精神变物质，关键就在于要使正确的思想变为广大群众的思想，变为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同时，毛泽东同志还从具体工作方法方面指出了某些必要的环节，比如：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一切经过试验，等等。

四、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和党的群众路线

在分析了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基础和辩证途径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并且用于指导工作，提出了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结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③《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一）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人的认识，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如果在实践中得到了预想的结果，这时，对于一定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①因为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是无限的，旧过程完结，又开始了新过程。新过程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这些东西是层出不穷的，需要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对认识发展的规律作过一些原则的论述。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终极真理”时，曾说明了认识发展的无限性。列宁在新的条件下，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和无限性。他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②他认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③又说过：“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④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长期而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总结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在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进一步概括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即是：“实践、认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④《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这一概括，鲜明地指出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深刻地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系统地阐明了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指明了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途径。这一概括是毛泽东同志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思想的伟大成果。

人类就是在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在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维，又从精神到物质、由思维到存在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掌握客观真理，一级比一级更高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②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深刻地总结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认识发展史，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群众路线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去，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转引自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见《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党的群众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经受考验。如此无限循环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一致起来了，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路线上来了。从认识论上给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而群众路线又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内容。

群众路线的公式与认识运动总规律的公式是一致的。首先，这种一致性就表现在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的一致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而认识世界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同时又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还明确讲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①所以，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是一致的。其次，这种一致性更体现在二者的辩证法思想的一致上，即体现在二者各自矛盾运动过程的一致上。因为“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投身实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从而把群众中生动的、丰富的但又是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形成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这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把集中起来的意见，即制定出来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补充和发展的过程，这也就是从认识（即理性认识）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往往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次循环是不行的，常常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如同实践和认识需要循环往复一样，对于革命工作来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要永不间断地实行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五章中还要谈到。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群众路线又是认识路线的具体运用，是表现于实际工作中的活生生的认识论，而且是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

五、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通过实践，达到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掌握客观真理，再用它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践的发展和认识发展的长远过程，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

（一）从真理和谬误的关系上阐述了真理发展的道路。

真理战胜谬误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早就有了许多精彩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指出：

“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②

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实践条件下，进一步把真理战胜谬误作为真理发展的规律提了出来。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③毛泽东同志这一概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毛泽东同志关于真理发展规律的概括，揭示了认识发展过程中一个方面的本质，即真理不仅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而且必定会战胜谬误。这比起恩格斯、列宁关于真理和谬误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思想，是深化和前进了一步。

第二，毛泽东同志把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三者联系起来考察，并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这对于推动这些科学的发展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第三，根据真理发展的规律，就要求人们必须勇于旗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鲜明地坚持真理、捍卫真理；同时又要为追求真理而勇于修正错误，批评错误，坚定地为实现真理而斗争。

（二）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上作出了主观与客观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

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无限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能力是绝对的，但是人的思维又是受一定历史条件限制的，一定时代的人的认识能力又是相对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是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的辩证过程。这个问题就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说：“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①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每一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②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③这说明了任何真理都具有两重性，它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的角度看问题，说明了真理发展的过程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就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555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了人们认识真理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之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这个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这一结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总是具体的思想。

关于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问题，列宁曾经强调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②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 α ）历史地，（ β ）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 ）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③毛泽东同志的结论坚持了列宁的上述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都必须注意它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不能笼统、抽象地讲统一。就是说，不仅在不同历史时代，实践的情况不同，而且在同一历史时代，各国实践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至于在同一国家处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它的不同地区，实践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在应用理论于实践的时候，必须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可能使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统一起来。

第二，这一结论深刻剖析了党内不同政治路线的认识论根源。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六年间，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尽管它们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却有着共同的认识论根源，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它们都是离开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则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其思想基础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结论划清了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

（三）从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上提出了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任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尖锐地批判了杜林的终极真理论，提出了真理是发展的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真理是过程。”^②他还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③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从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的思想出发，发挥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指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④后来，毛泽东同志还说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事情总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5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①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为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指明了方向。

第一，要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②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更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大胆实践，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自己的脑子有丰富的具体的感性认识。同时要开动脑筋，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检验和发展，不断地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接近。

第二，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不仅要求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而且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③

所谓改造客观世界，就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其中包括改造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们为

①《‘七大’工作方针》，见《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了改造客观世界必须改造主观世界；而改造主观世界又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进行。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①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②我们应该不懈地努力，为争取这样的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奋斗。

第三节 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讲的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同时又是认识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是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它所指出的是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矛盾及其运动，并根据这种认识，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其革命任务的艰巨性，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不断进行革命的实践，并逐渐求得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善于把客观辩证法化为主观辩证法，找出一种考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方法。这种主观辩证法，就是认识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及其他许多科学著作中，不仅阐述了客观辩证法，而且同时揭示了主观辩证法，即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彻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它不向任何旧的、保守的和腐朽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的势力低头，除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以外，它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所以，列宁称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①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就是辩证法。”^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高度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刻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研究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写下了许多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巨著，从而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这两个基本原理的提出，是对辩证法丰富内容的高度概括，阐明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完整的图景，从而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极为重大的新贡献。

毛泽东同志多方面地系统地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学说，这体现在以《矛盾论》为中心的一系列著作中。《矛盾论》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唯物辩证法学说的继续和发展，特别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的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他在《矛盾论》中，对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都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来进行阐述的。这就是既要全面地把握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观点，又要善于应用这种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矛盾论》最鲜明最突出的

①《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②《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特点。

毛泽东同志提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①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完成了这个“解释和发展”的历史任务，不但从哲学理论形态方面系统地写出了专著，在社会实际中，也作出了光辉的典范。

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呢？要证实它必须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从辩证法的作用上看，它必须处于辩证法理论的支配地位；从辩证法的内容上看，它必须是发展学说中最核心的部分；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上看，它必须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从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关系看，它必须是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实在内容；从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上看，它必须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论述。

（一）毛泽东同志澄清了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就已经包含有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早在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说：“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② 马克思的全部《资本论》就是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光辉应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哈论》中也完全贯穿着这一思想。他指出：两极的既对立又统一是“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①还说，“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②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明确地把对立统一的学说确定为辩证法的核心。这就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所处的支配地位和核心作用。

然而，一切机会主义者都竭力歪曲和抵毁对立统一规律。杜林胡说：哲学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③猖狂攻击矛盾的辩证法。就是普列汉诺夫也贬低对立统一规律，他把量和质的转化提高为辩证法的最主要的规律，而把对立统一规律只当作“实例的总和”。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哲学界把量和质的转化，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并列起来的错误观点泛滥起来，抹煞和贬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时，曾明确指出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但他并没有把这三个规律平列起来。尽管恩格斯当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而没有“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④但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对这些规律的内在联系已经作出了原则上的阐明。在恩格斯看来，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都不过是矛盾运动发展的状态和形式，而矛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的对立统一则是这些形式的实在内容，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比如在《反杜林论》中，直截了当地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辩证法”，“运动就是矛盾”，指明了辩证法的实质所在，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列宁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并不是一下子就提出来的。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还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谈到辩证法内容的六个方面：即否定的否定、飞跃式的发展、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矛盾是发展的内因、一切现象的相互联系和有规律的运动等。但就在稍后的时间里，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时写的《辩证法的要素》中，虽然还谈到质量互变和否定的否定，但他已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则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后来，列宁应用这一原理去分析、研究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策略，夺取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讲辩证法时，讲了四个基本特征（即联系、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对立面的斗争），但没有全力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在讲事物的联系时，忘记了对立，“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①不懂得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而讲事物的内在矛盾时，“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②这样，他就没有深刻把握辩证法的实质。因此，他没有能够澄清当时苏联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状态。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失为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但由于它存在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着一些理论上的缺陷，后来苏联的许多哲学教材主要是根据这本书来编写的，搞了不少形而上学。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在延安讲哲学时，也讲辩证法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的否定三个基本规律。后来没有把量变质变和否定的否定单独论述，而是把两者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放在《矛盾论》中进行阐述的。他明确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①并完整地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彻底纠正和澄清了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恢复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核心理论。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②后来他虽然还讲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的否定规律，永远普遍的存在。但他从来没有把三个基本规律平列起来。相反，他一再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③“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④在一九六五年，他还强调指出：要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不要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平列起来。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这决不是《矛盾论》的简单重复，而是现实斗争的科学总结，也是《矛盾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是辩证法核心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既清楚地指明了唯物辩证法有三个最普遍的基本规律，同时又深刻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样，既反对了把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平列起来的错误，又反对了把辩证法规律只归结为一个规律的错误。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毛泽东同志从宇宙观的高度，从两种宇宙观斗争的焦点，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

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思维和形而上学思维的根本区别时指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

“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①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列宁认为，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形而上学则否认它是对立面的统一，把发展看成简单的量的增减；辩证法把发展看成事物的“自己运动”，形而上学则把事物运动的原因放到外部；辩证法把发展理解为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即旧东西向对立面的转化、飞跃，形而上学则把发展了解为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总之，辩证法的观点是活生生的，而形而上学的观点则是死板的、贫乏的和枯竭的。

毛泽东同志从宇宙观的高度，详尽地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他不仅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②而且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形而上学“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①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就是说，不但要承认事物的发展，而且要承认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才是坚持了辩证法，彻底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这就清楚地说明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客观事物的发展表明，两种事物斗争的焦点，总是反映该事物核心的东西，因此，揭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也就阐明了辩证法的核心。

（三）毛泽东同志通过深刻揭示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精辟地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②毛泽东同志深化了列宁这一思想。他深刻地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③毛泽东同志用了大量的事实，从简单到复杂，从自然到社会，从客观到主观来系统地论证这个观点，很具体，很生动，很有说服力。这些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辩证法的实质，发展了列宁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原理。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运动、发展的学说。这个学说最主要之点，就是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如果不抓住这一点，辩证法的各个部分就会成为支离破碎、毫无系统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和没有灵魂的东西。关于源泉和动力的理论，是辩证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就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四）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对立统一规律同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宇宙观时，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虽然原则上揭示了辩证法三条规律的主次地位，但他们当时“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①这个任务，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列宁指出：只有对立统一的观点，“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②列宁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要确定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详尽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和其他规律及范畴的主从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详尽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同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实在内容，是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

毛泽东同志通过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与量变质变规律的关系。他运用具体的形象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即量变状态和质变状态。他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所引起的。”^① 他的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事物的运动过程都一分为二，分为两种状态，量变状态就是对立的矛盾双方暂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呈现的运动状态，而质变状态就是旧的统一体的破裂，新的统一体建立的过程呈现的运动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② 这就表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矛盾关系，也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第二，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即量变和质变，其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没有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没有矛盾着的两方面又统一又斗争，就不会有量变质变。可见，对立统一揭示了量变和质变的实在内容，而量变质变则把对立统一具体化。

毛泽东同志还论述了如何把握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的问题。在《矛盾特殊性》一节里，他根据矛盾发展的阶段性，创造性地提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光辉思想。如果不懂得矛盾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就不懂得部分质变的道理，也就不懂得在部分质变基础上的总的根本质变的道理，这样也就不能正确掌握整个量变过程。关于如何把握质的变化，他指出：必须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然后才能把握住质的变化及其质的阶段性。世界上所以有千差万别的事物，从一个质转化为另一个质，都是由矛盾的特殊性所规定的。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内部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认真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就成为我们正确把握事物质变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通过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的论述，分析了新旧两个矛盾的方面，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和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 第306—3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他给辩证的否定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①这说明，事物的飞跃形式是多样的，飞跃和转化是不断进行的，事物不断飞跃的过程，就是不断否定的过程。新陈代谢就是否定，就是扬弃，就是新事物不断否定旧事物，促成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化。

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充分说明，事物发展的否定的否定是由于内在矛盾所引起的，揭示出矛盾斗争的趋势。他说：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②这一论断，一方面，揭示了旧事物所以会被否定，是由于事物内部新旧两方面矛盾斗争的结果。否定之否定的内容和实质就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另一方面指出了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必然性和成长过程的曲折性，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特征。关于波浪式前进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大量深刻而精辟的论述。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是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在内容，而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形式和具体化。从根本上说来，这两个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298页

律和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就其本身来讲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丰富着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同志说过：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五）毛泽东同志从方法论的高度，深刻地指出矛盾分析的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进一步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许多著作和讲话中，都精辟地论述了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根本的方法。他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他还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②他还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③这就精辟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根本方法就是矛盾分析法，即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分析一切事物，其他方法都处于从属地位。辩证法宇宙观教导人们的東西很多，最主要最基本的一条是教导人们去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为，所谓认识世界，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认识事物的矛盾，即用矛盾分析方法去分析观察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按照矛盾的不同性质，运用不同的斗争方法，去解决各种不同的矛盾，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从毛泽东同志的多方面的系统的论述中，清楚地表明，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页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既是客观的普遍规律，又是思维规律；既是科学的宇宙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因此，我们必须以对立统一规律为中心内容来学习辩证法，才能真正地把握辩证法的实质，彻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

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提出来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说，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①他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概括，是在对列宁关于“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③的思想进行“说明和发挥”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的成果。

为什么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呢？为什么说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是由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矛盾的共性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2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在所有矛盾问题中处于特殊的地位，起着特殊的作用，弄清这个关系，不论是在掌握对立统一规律以至辩证法的理论方面，还是在运用这个关系的道理去指导实践方面，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曾经作了深刻的论述，我们党在几十年奋斗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也给了很好的说明。

（一）它揭示了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的关键所在。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包含着广泛的方面，涉及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①而在这所有的问题当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这是对立统一规律中任何一个问题都逃避不了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问题。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者互相联结，二是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相联结，说的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体。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矛盾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特殊性、个性，就没有普遍性、共性；而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又总是和普遍性、共性相联系而存在的。这是由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是孤立出现的，总是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而存在。任何具体的事物总是属于一类事物中的一个，它们不仅因为有其各自的特殊性、个性而彼此互相区别，而且又因为有其共同的普遍性、共性而互相联系，即是说，在不同中有相同，在个性中有共性，在特殊中有普遍。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①当然，这种互相联结的关系，不是形而上学的等同，而是辩证法的互相部分包含。普遍性、共性只是大致地包括了特殊性、个性，只是包括了各个特殊性、个性中的共同的东西，而不能把各种事物的特殊性、个性完全包括进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②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相转化，指的是由于范围、场合和条件不同，普遍和特殊可以互相转化。所谓普遍性、共性是指同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本质，所谓特殊性、个性是指同一类事物中个别事物所具有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同志指出：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③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正是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

①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互相联结又可以互相转化的关系，贯穿在对立统一规律所涉及的一切矛盾问题当中。比如，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矛盾的同一性是说，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讲的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又比如，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问题，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自身的内部矛盾，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但由于矛盾和矛盾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平衡性，而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再比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问题，一切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等等。

总之，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问题都体现着和渗透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或者说，各个问题都是这种关系在各个方面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展开。我们只有真正弄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才能真正弄懂关于事物矛盾的其他问题，才能真正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如果没有弄懂或者不想弄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那么，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就是说，不懂得它，就谈不上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等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二) 它说明了人类认识运动辩证法的客观依据。

弄清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不仅是掌握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的关键，而且也是掌握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法的关键，它说明了认识运动辩证法的客观依据。

既然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那么，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就必须把这两个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既要在特殊性当中发现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性。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①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从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然后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再后又以对一般事物的认识为指导进一步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毛泽东同志把这样一个秩序叫做：“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② 这样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

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过程总是首先在实践中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的许许多多的现象，取得感性材料，形成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对现象的多样性的直接的反映，尚未揭示出多样性的统一性，尚未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随着认识的发展，借助于抽象力，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在多样性中发现其统一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理性认识。这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就是从多样性上升到统一性的过程，也就是由矛盾的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殊性转化为矛盾普遍性的过程。

由于事物的本质是多层次的，我们不可能同时认识许多事物的本质，开始只能认识一个或几个事物的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待认识了许多事物的特殊本质之后，才有可能作进一步的概括，认识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和共同的规律。这种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又使该类事物与他类事物区别开来。这样，特殊本质对于现象是普遍性，对于共同本质又是特殊性。这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①的过程；也是列宁所讲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②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了由认识事物的现象到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再由特殊本质到共同本质这样层次不同、前后相继的由矛盾的特殊性向矛盾的普遍性的转化。

认识到此还不能算完成，因为，我们不仅要认识事物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而且要了解本质和规律怎样表现为现象，共同本质怎样表现为特殊本质。获得了带普遍性的认识并不是目的，目的还在于深刻地认识和解决一个个特殊的矛盾，并在这当中进一步检验已经获得的认识的真理性。所以，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事物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这些事物的特殊本质，这样就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就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上一个“由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殊到一般”的过程的直接的继续。从形式上看，两个过程的方向是相反的，但实际上，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并不是以一般为出发点，而是以一般为指导，去研究新的事物的特殊本质，去研究新的事物的现象，因此，在由一般到特殊中，实际上包括着新的由特殊到一般的转化。

由于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因而人类认识运动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科学的方法”，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人类认识发展的正常过程，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联结、互相转化的过程。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个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就不可能正确了解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认识运动的辩证法，因而也就在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三）它反映了科学工作方法的辩证法的精神实质。

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人们认识事物的矛盾是为了解决事物的矛盾。由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道理，说明了人类认识运动辩证法的客观依据，并由此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因此，拿了这种道理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去改造世界，就必然会产生出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总结并倡导了一系列的科学的充满着唯物论辩证法的领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方法用最简练的话来概括，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他说过：“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而在这个基本的领导方法中，毛泽东同志又明确阐述了它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则和方法，即一个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个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个“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或者更明确地叫作“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实际上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道理在实际工作的具体体现。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中的辩证法思想的精神实质。

运用这个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要求领导人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在许多单位的个别指导中，从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各各特殊的意见中，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形成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意见。而后，还要拿这一般意见再到许多个别单位去，在群众中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这些单位的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进行总结，集中新的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这样的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又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它的理论根据就在于很好地实行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相联结。

不能否认一般号召的作用。一般是同类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本质，是共性，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号召，可以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能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见面，可以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行动起来。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来。没有一般号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群众就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一致的行动步伐。但是，一般号召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个别指导，来自典型调查，来自试点工作。一个好的领导人员要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一定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些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他号召：“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②可见，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关系的道理，是正确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不懂得它，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群众路线方法的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就不可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就在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一贯思想。列宁曾经指出：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猜测这种特点。”^①这就是说，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我们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的思想原则的。但是，愿意实行这种结合与能够实行特别是善于实行这种结合还是两回事。我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是违反了这种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比较早和比较快地认识了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时间过了七年，毛泽东同志不仅更加坚定和发展了这个要相结合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并解决了为什么要相结合的问题。他在《矛盾论》中提出来的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不仅是对我们党长期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同时，又是从哲学的高度为党的思想原则、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按照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总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一个既包含有普遍、又包含有特殊的复杂结构的科学系统。其中，有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论述和分析；有根据这些分析而得出的个别结论；有根据许多个别结论得出的一般原理。在一般原理中又有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的差别。在个别事件、个别结论中也包含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方法。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由个别到特殊再到普遍的多层次、多系列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适用范围最广、普遍性程度最高的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首先就要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弄清这个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确定每一理论的适用范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对具体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直接反映该项具体实践的规律的理论，才能同这一实践相结合，也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正确的实践，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只有实行这种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论，以补充和发展原有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理论。在这个新理论中，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个性，即是一种共性与个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机结合。

同样的，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具体内容也都体现了这种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比如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种中国式暴力革命的新理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而创立的。

暴力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原则，适用于各个国家，当然也适用于中国。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但如何实行暴力革命，各个国家却有着不同的情形，不能千篇一律，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先取城市后取农村，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创造的成功经验，并且在一定范

围里具有普遍的意义，具有普遍性；但是对于暴力革命这个大的原则来说，对于另一范围中的国家来说，它又是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正是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道理，以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一般原理为指导，具体地研究了中国的国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并以这种新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同样道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的问题。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建设理论为指导，不仅要研究经济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还要着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加特殊的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走弯路，不断前进。

搞革命如此，搞建设如此，搞别的工作也是如此，都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都离不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道理，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真正自觉地实行这种结合。

（五）它提供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武器。

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势必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方面的教训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反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道理，严肃地批评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

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

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他们长期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拒绝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歪曲成抽象的公式、僵死不变的教条，甚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人的经验也都看成神圣不可改动的东西，一味地照抄照搬。结果害了革命，也害了他们自己。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哲学上就是割裂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普遍，否认特殊，把一般绝对化，从而抛弃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走入歧途。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①他又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与此相对立，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正是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我们党内，有一些人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到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在那里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工作，他们犯的就是经验主义的错误。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相比，出发点虽不同，但思想方法却是共同的，实际上他们是把狭隘的经验当作教条到处乱套。他们也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哲学上也是割裂了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在总体上，片面强调特殊，否认普遍，而在具体问题上，又把特殊当成普遍，把狭隘的经验绝对化，从而也抛弃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因此，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也是反对经验主义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并进而真正懂得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观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①

联系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分析起领导思想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实际工作指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且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两种形式兼而有之。一是无视新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习惯于滥用过去熟习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二是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作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这又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哲学的高度看问题，这些错误正是违反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正是背离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研究一下在日常工作中犯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错误的同志的思想原因，从哲学上讲，恐怕也是这个问题。

总之，仅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足可以看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不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中重要的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仅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的客观依据，而且是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精神实质；不仅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为反对主观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毛泽东同志说这个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列宁提出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理论，解决了如何掌握辩证法理论的实质和核心问题；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则是从更深一层，抓住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关键，揭示了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问题。只有牢牢把握住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并善于应用这个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去分析客观事物的矛盾，才能认识现实的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是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宝贵的理论遗产，是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三、要着重找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矛盾特殊性问题中，把主要矛盾和主

要的矛盾方面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通过分析，完整地提出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深刻地论述了对立面相互转化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概念。但是他们在具体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如，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所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① 列宁也曾经指出：“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② 这表明，在恩格斯和列宁那里，已经有要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关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就更为明显。马克思说得好：“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谈到确定主要矛盾方面的重要性时，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④ 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谈到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工作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心的改变时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①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并吸收了苏联三十年代教科书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明确地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非主要矛盾方面作为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并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形进行了深刻地论述，从哲学理论上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系统地总结，这是他理论研究的伟大成果。

（一）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的客观基础。

为什么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以及在各种矛盾中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平均看待，而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次要的两类呢？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矛盾以及矛盾的诸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宇宙间的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因此，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对立着的双方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所以，对矛盾着的双方也不能平均地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毛泽东同志说，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性，或均衡论。”^②这就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放在坚实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同时又用这个原理具体地阐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明了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均衡论。

事物所包含的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与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便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①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拒绝分析矛盾特殊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进一步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正确方针,在政治上反对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从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毛泽东同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②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为什么在《矛盾论》里特地用一节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加以详细地论述的原因。

(二) 给主要矛盾下了明确的定义,并阐明了找出并捉住主要矛盾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③又说: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①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主要矛盾下的定义。他还以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复杂关系论证了什么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论证还表明，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也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注意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

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②万干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固然起着决定的、领导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我们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可忽视非主要矛盾。为了正确地、顺利地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非主要矛盾。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虽然，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侧重于讲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明确讲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反作用，但是他在其他的著作和实践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杰出地应用了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并很好地解决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问题。比如，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指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地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促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复杂多变，毛泽东同志始终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坚持并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忽视国内的阶级矛盾。他说：“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的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①为了正确地处理国内各阶级间和各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对上述种种矛盾进行具体地、深入地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他指出，必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须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总之，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运用主要矛盾理论，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关系的杰出范例。

毛泽东同志运用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原理，提出了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把这种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他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就是说抓住了中心工作，就抓住了全局。在工作上，切忌不分主次、轻重地平均使用力量。抓紧中心工作，并不是可以放松其他工作，而是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②，把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学会“弹钢琴”，防止单打一。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是革命人民观察问题，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明确规定了主要矛盾方面的定义，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③他还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在一定条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①他还通过对矛盾两方面转化的分析，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②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出色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指导中，使其成为重要的方法论。

由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那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犯错误。但这决不是说，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不发生作用，更不是说可以忽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虽然《矛盾论》没有进行论述，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其他著作和实际运用中却是注意了这个问题。比如，在进行党内斗争时，他曾告诫我们，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可能出右。因此，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他还指出，在强调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的时候，不能忽视非本质和非主流的方面，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精辟地分析了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批评了那种把重点和非重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一点论，主张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强调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互相转化的原理贯彻到底，还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四、具体把握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强调了具体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重要性，详细地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的内容。

（一）明确概括了矛盾同一性的含义，特别强调了转化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详细地分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为我们如何理解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矛盾同一性的理论有不少明确的说明。他指出：“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①恩格斯在谈到正和负、原因和结果的对立统一关系时指出：“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彼此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②同样，原因和结果在“世界整体的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

^①《自然辩证法》第56页

^②《反杜林论》第20页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①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他指出：“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② 他还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③ 列宁的这些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但没有来得及加以详细论证和展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矛盾的同一性概括为两方面含义即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④ 也就是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⑤ 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明确概括以及应用大量的实证所作的具体论证，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关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是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有力思想武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毛泽东同志在说明同一性的两种情形时，特别强调了转化的重要性。他说，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一点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①为此，他用了较多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子来阐明转化的原理。为什么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同一性的更为重要的内容呢？因为矛盾着的对立面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可变的，事物只有通过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转化，才能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才能有质的飞跃，旧事物才会灭亡，新事物才会产生。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最具有革命性的部分之一。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②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深刻地分析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全局与局部，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集中与分散，得与失，前进与后退等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批评了只看到矛盾双方的互相对立，看不到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多次讲到好事与坏事、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等等看来绝然相反的东西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这些思想又进一步丰富了《矛盾论》中关于矛盾同一性的理论。

（二）深刻指出了矛盾同一性的唯物论基础，高度重视了对条件性的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①认为：“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②这就把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奠定在坚实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还通过许多生动的事例的具体分析，划清了两种转化论的原则界限，即划清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论和唯心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论的界限。前者讲的是具体的、现实的同一性；后者讲的是抽象的、幻想的同一性。那种神话或童话中所说的千变万化，是一种凭着想象和幻想构成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因而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事物时，必须做这种区分，即区分具体的、现实的矛盾和非具体的、非现实的矛盾。

在研究矛盾的同一性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条件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③这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第一，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所以能成为矛盾而具有同一性。如果两者没有互为存在的条件，就不能成为具体的、现实的矛盾，也就没有同一性。毛泽东同志曾举了鸡蛋、小鸡和石头以及战争、和平与石头的例子。战争与石头、小鸡与石头之间不是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互为存在的条件，即没有战争而石头仍然存在，没有小鸡而石头仍然存在，反之亦然。而鸡蛋与小鸡、战争与和平之间就是互为存在的条件，就构成矛盾，就有同一性。第二毛泽东同志以大量事例说明了矛盾转化时条件的重要性。他从鸡蛋转化为小鸡，从战争转化为和平，从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从中国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①后来，毛泽东同志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明确地说过：“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②因此，为了要促成事物向有利于革命方向转化，就必须具体地分析矛盾转化的条件，从而充分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积极创造转化的条件，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高度统一起来。离开了具体的一定的条件来谈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在哲学上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在政治上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三）进一步阐述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充分发挥了列宁关于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是绝对的原理。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具体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的关系。第一，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双方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两种本质属性。毛泽东同志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③就是说，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切矛盾的斗争都是在一定的统一体中进行的，如果对立双方彼此孤立，毫不相干，就不可能有什么斗争；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就是说，依存是斗争的依存，对立的依存，变动的依存，而不是凝固的依存，僵死的依存。转化更是斗争的结果。由于矛盾双方经过斗争，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才能转化。总之，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无论是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必然导致抹煞矛盾，陷入形而上学。

第二，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它们在矛盾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列宁曾经说过：“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具体阐明了什么是同一性的相对性，什么是斗争性的绝对性。他告诉我们：首先，同一性是暂时的。就是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②其次，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就是说，“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③“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④而斗争性所以是绝对的，这是因为：“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件的、绝对的。”^① 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我们的认识也应该如此。如果我们把同一性看作是绝对的，那就是把对立面的同一看作是僵死的、凝固的，就否定了事物的任何运动、发展和变化，陷入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如果把对立面的斗争看作是相对的，那就否认了对立面本来就是互相排斥的、互相斗争的，就会陷入矛盾调和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还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做了杰出的运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依据这一理论，制定了著名的统一战线政策，既反对了只要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只要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从而引导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依据这一理论，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揭示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本人，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党与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等等的对立统一关系。

毛泽东同志对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对我们坚持彻底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诡辩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五、正确认识和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中，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对抗，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斗争的对抗性和对抗形式。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①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②马克思恩格斯还研究并提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研究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对抗性及其表现形式，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列宁提出了“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灭，矛盾仍将存在”③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矛盾的斗争性时，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特别提出来加以单独的论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上述思想。

（一）明确指出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并作了具体说明。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④矛盾的斗争性是普遍的，绝对的，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归结起来，毛泽东同志认为矛盾的斗争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的形式：对抗的形式和非对抗的形式。

对抗是矛盾双方采取外部冲突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在人类社会，存在着阶级的对抗，在“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⑤，都是对抗的形式。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阶级社会，研究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②同上第3卷，第311页

③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抗形式，“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①这就明确规定了矛盾斗争的对抗形式在矛盾斗争形式中的地位和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在研究矛盾的斗争形式时，不应当对一切事物一概而论，因为，矛盾斗争还有另一种形式，那就是非对抗形式，即是一种不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斗争形式。这种形式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也大量地存在着。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结合社会领域中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矛盾斗争的对抗和非对抗形式，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对抗是解决敌我矛盾的斗争形式，具体说来，就是对敌人“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②而非对抗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实行“团结——批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③他还提出了在科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斗争的对抗和非对抗的划分，从理论上概括了矛盾斗争基本形式问题，为我们解决矛盾指出了方向。

（二）提出了矛盾斗争性质决定斗争形式的理论，并说明了矛盾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对斗争形式的影响。

为什么矛盾斗争会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呢？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页

首先，矛盾斗争的形式取决于矛盾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①又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②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的特殊本质，从而决定不同的斗争形式，切不可将解决某一种矛盾的方法当作公式去套在一切事物上。一般说来，对抗性的矛盾发展到最后，要用对抗的形式去解决。而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非对抗的形式去解决。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解决。”^③毛泽东同志还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再一次肯定了矛盾的性质决定矛盾斗争形式的思想。

其次，矛盾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也影响着矛盾的斗争形式。要正确地确定矛盾的斗争形式，不能简单地根据它的性质就着手解决矛盾，还要注意分析矛盾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即使是同类性质的矛盾，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情况。矛盾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构成一定性质的矛盾也有一个逐渐外显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包含的对抗因素决定的，并且是资本主义矛盾逐渐发展的结果。他说：“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①这就是说，对抗性矛盾在它的发展初期，矛盾的斗争不表现为全面的对抗，而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才表现出来。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②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举例讲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③所以，在决定对某种矛盾采取什么斗争形式时，除了首先要分清矛盾斗争的性质之外，还应该分析这种矛盾所处的发展阶段。

（三）阐述了两种矛盾斗争形式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思想，并说明了矛盾斗争形式与矛盾斗争性质之间的辩证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5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关于斗争形式转化的问题，列宁曾经以工农之间的矛盾为例，说明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农民实行不正确的政策，就可能引起工人和农民的对抗，产生工农的分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进一步作了理论概括。他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前者，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

“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②但是，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或者对犯错误的人采取不正确的态度，过火的斗争，

“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③后者，如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本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④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的性质就不会转化，因而矛盾斗争形式也就不能转化。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一思想特别分析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指出：“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

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①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实际上也说明了矛盾的斗争形式与矛盾斗争的性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说明了矛盾性质变了，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变化，即“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②又说明了斗争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正确与否对于矛盾的性质、矛盾的发展也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如果斗争形式不当，往往也会引起矛盾斗争性质的变化。这特别表现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处理上，“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主张把反帝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并列起来，甚至把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搞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与此同时，又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用对待罪犯和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实际上很多是正确意见的同志，在政治上犯错误，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④这个教训，我们党在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九五七年以后仍有很沉痛的教训。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正确地地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对于革命事业的成败具有重大的意义。

简短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理论宝库中的不朽的著作，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以及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都当之无愧地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系统论述的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以及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等理论；在《矛盾论》中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深刻阐明的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以及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等思想；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

《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中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重要论著，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都是《实践论》和《矛盾

论》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领域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所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重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又要看到，《实践论》、《矛盾论》并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部。那种以为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就可以全部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除这两本哲学专著外，毛泽东同志还写了其他的哲学专著和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在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等问题的许多重要著作中，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又要着眼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和整个革命实践活动。

《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就不需要和不可能发展了。恰恰相反，毛泽东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还需要在不断发展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讲《实践论》、《矛盾论》时就打算写一部更好的哲学讲义（可惜没能实现）；他后来在《矛盾论》重新发表时，就作过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而且他在解放后还特地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我们应该取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态度。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随着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和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坚持《实践论》、《矛盾论》基本思想的前提下，总结具体科学的新成果，概括实践当中的新经验，不断地去丰富它，发展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地推向前进。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认识论和辩证法发展的新篇章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他直接组织、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和我军的建设长达半个世纪。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战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矛盾之复杂，情况之多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迄今为止，毛泽东同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史上经历军事实践时间最长，战争经验最丰富，军事理论最完整系统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他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所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智慧之花，也

是毛泽东同志辛勤劳动的丰硕之果。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又是“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的范例。”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中，军事思想和哲学理论，水乳交融，相互辉映，它既体现着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而且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它既是我们学习军事理论的教科书，又是我们学习哲学思想的教科书。

第一节 唯物论在战争中

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和考察战争，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类型、革命战争的作用、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消灭战争的途径以及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的历史作用等一系列战争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科学的论断，从而把研究、领导和指挥战争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基础上。

一、战争的起源和本质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

最高的斗争形式。”^①这就给战争规定了科学的定义，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这是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人类战争史所作出的科学的结论。

第一，这一定义表明，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它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阶级的消亡而最终归于消灭。这就是战争的历史根源和阶级实质，以及战争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这一定义还表明，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就是说，各个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用经济的或政治的斗争形式来解决时，就必然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并用以扫除经济的、政治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样，战争就成了解决政治或经济问题的一种特殊的最后的手段。

战争既然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那么战争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研究、领导和指挥战争的人必须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的定义，实质上已经相当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战争既然是敌对势力或集团之间的暴烈的武装对抗，它要解决的就是战争中敌我双方的矛盾，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都用专章、专节进一步作出了明确的、系统的论述。他说：“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① 他还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② 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③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战争本质的同时，也揭示了战争的基本矛盾。在战争中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这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组成了战争的整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它“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④ “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⑤ 也就是离不开这个战争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因为“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⑥ 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争中的杰出运用。

二、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从事战争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战争呢？这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

毛泽东同志从战争的阶级本质出发，对战争作了科学的分类。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⑦ 他在《论持久战》中也说：“历史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5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9、45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6页

⑤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指明了共产党人要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毛泽东同志这些论断和列宁所说的：“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②是一致的。列宁认为，要判明战争的性质，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战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从战争的阶级本质出发去分析战争，把战争区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区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并非是道德标准，而是政治标准。既然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总是和一定阶级、一定政治相联系，而阶级有革命的和反动的之分，政治也有革命的和反动的之别，因此，战争就必然区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凡一切革命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而一切反革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阻碍历史前进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尚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③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对于正义战争不但要竭力支持，积极参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而且要热情歌颂，高度赞美，为了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去流血牺牲，英勇战斗。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尖锐地批驳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时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①紧接着又说：“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②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③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阐明了革命战争在改造社会，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辩证法。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从事革命战争呢？从事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专门以“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为题进行了论述。他说：“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④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⑤这就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在战争目的上的泾渭分明的立场和观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毛泽东同志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他深刻地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和战争的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然而，“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①“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阶级是要消灭的，国家是要消灭的，那时，战争必将消灭，永久和平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的远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消灭战争的具体办法和途径时指出：“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③历史的战争实践表明，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被压迫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要想获得独立、自由和解放，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所谓“和平”和“人道”的说教上面，也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仁慈”和“明智”上面。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组织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力，用革命的强权反对反革命的强权。这样，才能获得解放，消灭战争，赢得和平。

三、兵民是胜利之本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区别历史唯心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从而奠定了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形成了人民战争的完整理论。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不仅在军事著作中，而且在其他许多著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中，都深入地阐明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深刻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兵民是胜利之本”。^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当然，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正确的领导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战争胜利的取得，最根本的是靠广大士兵，靠人民群众。战争的实践表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①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是科学真理。

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必须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战争。为此，在建军思想上，要实行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宗旨，要贯彻执行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军队的三大任务、军内的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和规定；在斗争形式上，要实行武装斗争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战线等方面的斗争相结合；在组织形式上，要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在战争形式上，要实行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在作战方针上，要实行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样，就能形成真正的总体的人民战争。

为了扫除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障碍，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批判了片面夸大武器在战争中作用的“唯武器论”。

无产阶级军事家和资产阶级军事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之一，不是承不承认武器的作用，而是人和武器哪个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无产阶级不但不否定而且很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强调要努力增加新式武器，重视技术条件的现代化。他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①还说：“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谈到加强国防建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可见，毛泽东同志对武器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以及保障社会主义祖国不受侵犯的重要性，都给予高度的重视。

然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同“唯武器论”者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唯武器论”者把武器看成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根本抹煞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就是“唯武器论”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所以中国“抗战必亡”，“再战必亡”。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痛加驳斥。他深刻地指出：“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④这就揭露了“唯武器论”的认识论根源。“唯武器论”是唯心史观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军事家们脱离人民群众、轻视人民群众、敌视人民群众的阶级本质。

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唯武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武器和人力的相互关系。他说：我们“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这是战争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劣势装备的革命军民充分发挥人力和人心的作用，战胜以优势装备的中外反革命军队的历史，是人民战争胜利的历史。但当原子弹出现以后，有的人认为原子弹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人民战争的思想过时了。对此，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②他还说：“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③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极端重要的论断。这不仅彻底批驳了“唯武器论”的荒谬论调，歌颂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胜利信心，从而坚持了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则。

为什么说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这是因为：第一，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非正义战争是失道寡助，虽有优势装备也不免败北；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虽只有劣势装备也必将取得胜利。第二，在人和物这两个因素中，无论是军力、经济力中人的因素居主动地位，物的因素居被动地位。武器由人制造，要人去使用。离开人，武器自身不会发生变化；离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9页

人，就是毁灭性的武器也等于零。恩格斯说过：“枪自己是不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①第三，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武器的优势与劣势也会发生变化，既然武器可以由人去制造，其优势也可以由人去打破。诚然，现代化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是空前的，但武器越发展，越需要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人去掌握它。哪怕是高度自动化的武器，离开人也只是废铁一堆。而且，在现代反侵略战争的条件下，生产现代化的武器、物资、装备，虽然需要组织全国的经济力量，但更需要动员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去英勇战斗，才能赢得最后胜利。

总之，关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战争中，承认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伟大的物质力量，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就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这是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是人民战争理论的核心，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认识论在战争中

毛泽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从方法论的高度创造性地把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识论运用于战争，论述了战争中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指出了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阐明了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论证了战争中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等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战争中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战争是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存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人类社会中最复杂、最尖锐、最激烈的一种斗争形式。它不仅是战争双方物质实力的竞赛，而且是双方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对人们的认识、计划、方案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最彻底。在这里，谁不明了客观实际，谁违背客观规律，谁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会立刻招致不可避免的惨重失败。因此，在战争中力求做到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这是战争指导者们必须时刻关注的，关系到战争成败的重大课题。

在哲学上，精神和物质、思维 and 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凡是主张物质派生感觉、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凡是主张感觉、精神派生物质，从主观到客观的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革命人民手里的尖锐武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中，一切战役、战斗是胜利还是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根本上说来是背离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主观指导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其军事学说中，坚持和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

战》中，对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对于战争“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① 不仅战争如此，而且“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② 这表明，要研究、领导和指挥战争就必须把握它的性质、特点以及它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即把握战争的客观规律，从而正确处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求在战争中多打胜仗。

但是，由于战争情况复杂，瞬息万变，敌我双方不但互相保密，而且互相诱骗；由于战争具有巨大的流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实性等特点，因而，古今中外，许多军事指挥家、理论家都认为，战争根本无规律可寻、不可捉摸，只能由偶然因素和主观意志去支配战争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其军事著作中，一再批驳了这种唯心史观的错误观点。他指出：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③ 他还说：敌我双方“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④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战争中只做到“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者“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片面的，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他非常重视《孙子兵法》中“知彼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16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己，百战不殆”这句名言。他说：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①就是说，只要做到“知彼知己”，把握客观规律，就能全局在胸，克敌制胜。

毛泽东同志一一驳斥了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并对战争的特点做了具体分析，总结了战争规律。

关于战争的不确实性。的确，战争现象比之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这是战争的一个特点。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谈到战争的确实性与不确实性时指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②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侦察手段的提高，又使战争的确实性的程度大大增加。总之，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充分运用各种侦察手段，收集情报，经过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做到符合客观实际，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就能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就能多打胜仗。

关于战争的流动性。这是战争的又一个特点。由于战争的流动性，有的人就根本否定战争的相对固定性。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虽然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但可以通过对流动性的认识，把握其相对固定性。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出：“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①“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②他尖锐地批判了只承认战争流动性，否定其相对固定性的战争相对主义者。他说：“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③因此，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流动，一种是数的流动，一种是质的流动。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虽然是流动的，但它只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只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正由于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这就是在一定时间内的战争的相对固定性。因此，就有可能制定反映战争实际的计划和方针。

由此看来，不管战争情况如何复杂多变，战争特点如何难以捉摸，如孙武子说的那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只要坚持运用反映论原则，经常保持镇定的情绪和清醒的头脑，就能达到主观符合客观，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他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④紧接着又说：“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地符合起来。”^①这里说的是在战争中主观符合客观的极端重要性，它关系着战争的成败。

然而，努力做到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能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理解为绝对的、完全的符合，而应当灵活地、辩证地理解为相对的、大体的符合。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②这就指明了认识的相对性和近似性，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获得相对的真理，而不能去奢求什么完全的绝对的真理。

事实上，不仅战争是如此，就是一般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也不是完全等同的、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近似的，在相对中包含着绝对，反映着规律性的认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③他还尖锐地批判了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同”论。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之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④就是说，关键在于掌握事物发展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页

律，在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做到主客观基本相符。这就需要搞好调查研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二、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通过总结战争经验，实际上已经阐明了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阐明了军事问题上的学习与使用的关系、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领导和指挥战争中，历来十分强调战争实践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活动。他认为，对于战争规律，“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① 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学习和使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同志既重视间接经验，更强调直接经验。他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② 学习这些前人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事事都直接经验，拒绝学习，固执己见，那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这是一方面。然而，另一方面，就是要“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③ 他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④ 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战争的血的经验教训，批驳了那些照抄照搬前人的和外国的战争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教条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者。他说：“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①照搬别人的间接经验是不能解决现实的战争问题的，只有把间接经验和自己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才是有价值的。鉴于党内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毛泽东同志着重指明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掌握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极端重要性。

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必须通过战争实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说：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②这是一段十分生动、感人又十分精辟的论述，而且包含着浅显而又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其一，“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深刻说明了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体现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其二，“干就是学习”，提出了干、学、再干、再学的认识战争的公式，这里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初步表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其三，“干革命，干战争”，这是消灭“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距离的最好办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法，这说明实践出真知，通过战争实践，对战争的认识可以从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从片面的知到比较全面的知。人类战争史证明，战争提出的问题只有依靠和通过战争实践才能解决。我们党正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实践家，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和军事理论，不断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从来都是尊重战争实践，而不死守某种一成不变的公式。正是由于这样，他才能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人民军队，使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最后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

三、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军事领域，系统地阐明了战争中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在哲学发展史和军事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关于认识的辩证途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系统地发挥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阐述的思想，阐明了人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

然而，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对认识的辩证过程，作出了极其生动、极其精彩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系统地阐明了

指挥员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了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一飞跃的正确途径。

第一，利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去做“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获取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是正确实现由感性到理性飞跃，即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的前提和基础，为实现这一飞跃提供了可能。这里的侦察，就是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必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粗心大意的军事家或鲁莽蛮干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就不免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上，就非碰壁不可。

第二，必须将侦察得来的各种材料，联贯起来“加以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4页

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这是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基本途径和方法。这里所讲的粗与精、伪与真、此与彼、表与里，都是认识中的对立统一。指挥员通过侦察得来的感性材料，往往是粗精混杂、真伪莫辨、彼此分离、表里不一的。这就要采取辩证思维的方法，加以分析与综合，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去粗取精”，就是舍弃无关大局、可有可无的材料，抓住最能反映战争本质的、主流的东西，不要为非本质的、支流的东西所迷惑；“去伪存真”，就是去掉虚假的、错觉的东西，揭示战争的真象，不要认假为真，为假象所蒙蔽；“由此及彼”，就是把片断的、不完整的材料联贯起来思索，找出战争现象的来龙去脉和相互联系；“由表及里”，就是透过现象探索本质，把握战争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

对战争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飞跃为理性认识，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要完成对一个具体战争的认识过程，还需要由理性认识再回到战争实践，实现战争认识过程的更重要的能动的飞跃。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由战争的理性认识再回到战争实践中去时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在这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里，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由战争的理性认识再回到战争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从战争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不是战争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认识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的，战争认识服务于战争实践。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战争计划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战争的目的。如果制定的战争计划、方案，不付诸战争实践，而束之高阁，那么再好的计划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决不可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

第二，战争的认识只有回到战争的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战争的认识正确与否，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一般的认识如此，对战争的认识更是如此。事实表明，经战争实践的检验，原计划部分地改变的事是常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蛮干，结果是非碰壁不可。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把对具体战争的认识过程，区分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集材料，进行思索，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计划付诸实行，在战争实践中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认识的阶段。对这个认识过程，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把它明确地概括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两个飞跃。而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则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所有这些表述，思想都是一致的，把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高度地统一起来，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体现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本质特征。这是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又一突出贡献。

四、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认为，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认识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①列宁也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毛泽东同志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对主观能动性的概念作了科学的表述，对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作了系统的发挥，对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作了生动的说明，从而阐明了主观能动性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理论。

（一）自觉能动性的内容、特点和表现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③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军事运动，把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观能动性表述为自觉能动性，揭示了自觉能动性的内容、特点及其表现。

第一，自觉能动性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它包含着思想和行动两方面。人们在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为着实践的需要，怀着一定的目的和动机。人们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先在头脑中形成所要达到的目的，制定出计划方案。在战争中，指挥员总是“根据客观事实”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去构造夺取战争胜利的思想蓝图。战争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思想蓝图和预定目的而展开的。

第二，自觉的能动性是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它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而战争是人类自觉能动性最突出、最鲜明、最生动的表现，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显著的特点。恩格斯说得好：“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①

第三，自觉能动性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自觉能动性不仅包括着认识，更重要的还包括着实践，把主观的蓝图转化为客观的现实。在战争中，就是把夺取战争胜利的计划、方案，付诸战争实践，把可能变为现实。正如列宁说的：“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②

（二）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和途径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①他还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论述了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是由作战双方客观物质条件决定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去期求战争的胜利，这就坚持了唯物论，反对了唯心论。同时，他又指出，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在客观因素具备着胜负可能性的条件下，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这时自觉能动性就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要使自觉能动性得到实现，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必须遵循一定的条件和途径。

第一，必须认识和遵循战争的客观规律和客观的物质条件，这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基础。只有从战争实际出发，建立在战争规律和物质条件基础上的思想、计划、方案，才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这里，毛泽东同志用舞台和导演的形象化的比喻，生动地阐明了客观物质条件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掌握战争规律和认识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战争的具体实践是实现和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根本途径。这就是要去“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战争既然是有目的的活动，必须通过具体的战斗去达到目的。为了消灭战争，只有去进行战争，为了消灭敌人，只有去进行战斗。因此，战争中自觉能动性实现的过程，就是战争的实践过程，通过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解决战争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完成战争的任务，实现战争的目的。离开战争实践，所谓战略、战术、计划、方案，只能是镜花水月、纸上谈兵。

第三，在战争中，要把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群众是实现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毛泽东同志在强调战争指挥员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士兵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他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②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就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和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的方针，提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的方针。后来，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断。他还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战中去，把部队指挥员的自觉能动性和群众的自觉能动性高度结合起来，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三）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毛泽东同志还在其军事著作中，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作战指挥问题，也是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突出的表现形式。

主动性——军队行动的自由权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自觉的能动性时，还谈到主动性，并回答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而“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②在这里，从不同的侧面讲了二者的区别和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强调了把握主动性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性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别强烈的表现。因为，主动权是战争胜利的钥匙，“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③为此，战争的双方，无不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主动权只是聪明的领导者虚心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它“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④那末，获得主动权要具备什么条件？如何去争取呢？

第一，要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战争力量的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页

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①在战争中，战略的主动地位，当然以战略的进攻战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但是，在战争史上，这种绝对优势和绝对劣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开头是很少见的，只是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才较为多见。但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这是由于战争出现了妥协、战役出现了对峙的情况，不过这是少数。而多数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的。在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一般说来，战争双方在物质力量的对比上只有相对的优势或相对的劣势，从而决定着相对的主动地位或被动地位。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军事上著名的“三大通则”，这就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②就是说，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摆脱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许多战役和战斗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摆脱。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要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由于在战争中绝对主动和绝对被动是很少见的，往往是相对主动和相对被动。因此，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就成为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1—452页

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①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主观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战争史上，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是很多的。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列举了中国的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取得胜利的。这充分表明，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因此，主动和胜利，可以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取得一定的条件，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居于劣势和被动的一方，完全可以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

第三，要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毛泽东同志说：“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②什么是错觉？就是指的“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的一个方法。“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则是错觉的一个例子。在优势的民众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常能有效地陷敌于苦境，丧失其优势和主动。什么是不意？就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4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①如果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常可以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击，把优势者打败。所以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军处于不意即无准备之中。只要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民众，把老百姓武装起来，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聋子和疯子，用以夺取自己的胜利。这些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灵活性——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

什么是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战争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②还说：“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③而且要经常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等。这些方法都是主动性的具体表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懂得一些具体作战的战术或方法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④所以，他强调指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

之妙’。”①只要有这种“运用之妙”，在客观情况基础上，就能够改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对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和击破敌人，夺取最后胜利。

计划性——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要实现计划性于战争，同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物和工作比较起来，要困难得多。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能离开计划性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②战争的指导者应根据战争的特点，尽可能地制定严密的计划，就是一切行动要有预先的准备工作。诸如，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备、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应当过细考虑、检查执行。“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③因此，不论是战略计划、战役计划、还是战术计划，都应当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也应当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④总之，“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⑤就是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4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

处处照顾到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取得军队的行动自由权。

综上所述，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都极大地表现了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表现了主观能力的竞赛。主动性，要求对一切进攻战都要主动地组织攻击，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性，要求灵活地使用兵力，围绕着进攻这个中心；计划性，其所以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

我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历史，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战斗历程，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尊重客观规律，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思想是无比正确的。它是革命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第三节 辩证法在战争中

毛泽东同志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创造性地把辩证法运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从而完整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

一、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

相互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论述，指出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夺取战争和革命的胜利的重大的意义。

（一）战争与政治

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歪曲辩证法时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①他还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识别它呢？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②他对德国贵族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兹提出的：“战争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通过另一种不同手段的继续”的名言，作了一番改造，给予历史唯物论的解释，并赋予新的政治内容。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思想，对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一，毛泽东同志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③他在讲到抗日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3—2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①这就是战争的一般性。因此，那种轻视政治倾向，把战争和政治割裂开来，把战争孤立起来的战争绝对主义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

然而，“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②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列宁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论断，并作了发挥。他认为：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就会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上的障碍。障碍扫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然继续进行，以求贯彻。此外，由于战争的特殊性，战争有它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总之，战争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否认战争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是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把战争和政治完全混淆起来的等同论也是错误的，也应当加以纠正。

“战争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是观察战争的一个重要原理。不懂得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就不能认识战争的性质，不能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夺取战争胜利的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运用这一原理，着重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指明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内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在联系，指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总根源，并揭穿了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卖行为。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一原理，着重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途径。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寡助多助等四个互相对立的特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野蛮性、退步性和国际的失道寡助，阐明了中国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和国际上的得道多助，从而揭示了中日战争的政治本质及其发展的总趋势。他指出：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①但在抗日战争中，亡国论者只看敌人在军事上的暂时强大，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了解战争的政治本质；而速胜论者则不懂得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因此，他们都不能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

第二，毛泽东同志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则，运用于人民军队的建设上，提出了政治建军的原则。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他在调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查研究的基础上，批判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阐明了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把政治建军原则系统化和理论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利，是要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这个政治目的。而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坚持共产党对抗战的政治领导，必须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的政治动员，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他强调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的应有的效力”^①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文献中，提出了在军队内部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开展三查、三整，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的整军运动。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对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建军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原则和方针，是无产阶级政党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极其珍贵的财产。

第三，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战争和政治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法。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在回答一些爱国志士怀疑国内政治不能进步的忧虑时说：“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①他指出：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年的进步。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是正义的革命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还把坚持抗战和建立新中国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只要坚持抗战，就一定能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实践表明，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又赢得了进步。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二）战争与革命

战争与革命，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极端重要的方面。由于其重要，所以必须特别提出来加以分析和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其军事著作及其他著作中，对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和社会革命论。

首先，毛泽东同志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各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4页

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这互相矛盾着的两个阶级，当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就会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这个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①这就揭示了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基本观点。历史的发展表明，这是科学真理。

在中国近代社会里，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随着这些矛盾的发展及其斗争的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中国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其次，毛泽东同志揭示了革命与战争的内在联系，并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分析在不同条件下的革命和战争的具体途径。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②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个科学论断。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矛盾的共性、普遍性。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条件不同，即矛盾的个性、特殊性不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实行这个原则的途径也就不同。毛泽东同志认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里，国内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由于这些特点，就规定了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一旦时机成熟，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生动的例证。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情况就不同。在中国，其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由于它们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因此，中国革命不是迅速可以胜利的，而是长期的和曲折的，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夺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历史表明，这是革命和战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革命和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科学的革命真理。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对于革命和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时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

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①在这里，他进一步说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以历史经验告诫我们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既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如果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彻底克服它们，那末，正确路线的建立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被中国革命和战争所一再证明了的科学论断。

二、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战争过程中，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运用于观察战争，从而揭示了一般战争规律和特殊战争规律，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及其战争的指导规律，指出了一切战争指导规律都是依照历史和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这就为考察战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唯物辩证法是研究战争问题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战争规律的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一开篇就说：“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他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②这就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战争问题上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正确认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正确研究和把握革命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战争血的经验教训中所得出的重要的哲学结论。这一思想后来在《矛盾论》中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共性个性、普遍特殊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理论。

一般战争的规律是应该研究的。它反映着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战争的共同本质和规律。它普遍存在于一切战争之中，并贯彻战争过程的始终。例如：“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基本指导规律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争的基本战斗形式都是进攻与防御，等等。因此，认识和掌握一般战争规律，就能给人们指明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给战争实践提供一般的指导性线索。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这是因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后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①这就指明了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的重要性。

然而，一般战争规律固然要研究，而特殊战争规律更应当研究。这不仅是一般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一般战争规律寓于特殊战争规律之中，而更重要的是要在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下，去揭示特殊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不这样，就不能指导特殊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失败。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②如果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形、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规律，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毛泽东同志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批驳了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的种种奇谈怪论。一曰，只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照抄一般战争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二曰，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照搬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军事条令就行了；三曰，中国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只要学习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就足够了，等等。在这里，如果说前两种机械论是把一般战争和苏联内战的规律神圣化、教条化，陷入僵死的军事教条主义的话，那末，后一种机械论则是把我国北伐战争经验凝固化、刻板化，陷入狭隘的军事经验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论是一般战争规律，或是苏联内战规律，还是我国北伐战争经验，都是应当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丝毫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多次证明了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长时期里，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否认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因而拒绝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去制定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一味照抄照搬苏联内战时期的作战经验，结果一再遭受挫折和失败，未能打破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最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在研究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①他说：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我们应当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对此，他做了具体分析。

从时间说，就是要从发展看问题。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乱搬乱套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从地域说，就是要注意空间的特殊性。各个国家、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自己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生搬硬套。诸如，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大国和小国不同，宗主国和殖民地不同，山地和平原不同，城市和农村不同，等等。这些地域的不同，就要求掌握在不同空间作战的特殊规律。

从性质说，就是要区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战争，不同性质的战争各有不同的特点，也各有不同的战争规律。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是得道多助；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则失道寡助。因此，不同性质的战争规律决不能机械地套用。革命的人民战争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也有自己的一整套战略战术。

总之，研究、领导和指挥战争同认识其他事物一样，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在战争问题上，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之所以一再受挫，连吃败仗，就在于静止地、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在思想上，陷入了机械论和唯心论。

（二）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研究战争及其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

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在《论持久战》中，他又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②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③这就为我们揭示了研究战争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敌我双方具体的力量对比，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他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④他认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同时，他依据这些特点，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分解为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即第一、四两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另一方面，即第二、三两个特点，则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发生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4—41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①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史充分证明这个规律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也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明了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这就是说，要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具体地分析中日双方的全部矛盾的特点，找出中日战争的特殊性及其时代特征。

第一，用客观的全面观点考察中日战争，揭示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基本特点。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双方所处的地位、条件和历史时代，分析了敌我双方四个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③中国则相反，“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④总之，敌人有一长三短，我有一短三长。在日本方面的四个特点中，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最本质的特点，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⑤而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是中国方面的最本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6、41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6页

的特点，“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①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双方各个基本特点的具体分析，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科学论断，并由此出发规定了一整套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从这里发生出来”。^②实践表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无比威力。

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主观臆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不是互相分裂、彼此隔离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就必然要犯错误。因此，必须客观地全面地考察这些特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个矛盾，而无视其他矛盾，并加以无限夸大。他们不懂得对中日双方的矛盾特点作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而只是用抽象的空洞的历史类比，得出“亡国”的结论。速胜论者则相反，他们或者根本忘记强弱这个矛盾，只抓住其他的矛盾；或者把中国的长处作了脱离实际的夸大；或者把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从而得出“速胜”的结论。不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都是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反映战争双方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也就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来。

第二，着重从时代特征来考察中日战争，阐明了中国必胜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日战争时非常强调时代特征。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他说：“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①在这里，他不是一般地抽象地指出日本的退步和中国的进步，而是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特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他指出：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处于退步时代，从社会的行程来说，是垂死的、腐朽的、没落的时代。它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不同，就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也不相同，而是处于世界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遭到了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然而，此时的中国，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而是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个进步不是普通的、一般的进步，既不同于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同于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那种进步。今天的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七年的经验。在国际上，中国又能得到苏联和世界上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的援助。因此，“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②

第三，从变化发展的观点考察了抗日战争的具体进程，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

论述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和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把抗日战争科学地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规定了持久战三个发展阶段之间的战略转变，提出了每一阶段相应的战略战术要求。

毛泽东同志还创造性地运用量变质变规律，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全过程。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变化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为了说明这个发展的具体过程，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向上的变化和向下的变化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新的质和量同旧的质和量的概念，并把上和下、量和质同矛盾的性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指出：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日双方都有向上向下两种变化。中国方面，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表现在：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削减和消耗，而这种“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②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表现在：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而这种“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③敌人方面，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民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巨额的财政支出，国际舆论的谴责等等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0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5页

面,这就“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①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表现在:土地、人口和资源的扩大。但是敌人这种向上变化是暂时的和局部的。第二、三阶段,上述的变化将继续发展着。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将失去优势。最后,中国实行反攻,彻底消灭日本的侵略势力。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将会出现怎样的战争形态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这将是一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②“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③具体表现为:我军主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击敌人的奇观,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我军既有有后方作战,又有无后方作战,表现了革命战争的特点;既有敌军对我军的几重包围,又有我军对敌军的几重包围,将陷敌于天罗地网之中。这样,从战区到敌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的广大地区内,到处都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④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⑤他说:亡国论者看敌人为神物,看自己如草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5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6—437页

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①

抗日战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预见。这在哲学史上和军事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为在战争中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三）战争中波浪式发展的曲折前进过程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战争过程中，他还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波浪式发展的曲折前进过程。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在总结武装割据的经验时就指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②

“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③他还说：“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④这就是说，战争发展的规律同其他事物一样，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

曲折性——是波浪式发展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土地革命时期，从游击战争开始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军和红色游击队，革命根据地周围，经常遭到敌人的“围剿”，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1—48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页

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总是把它围起来。而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是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①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迂回曲折的反“围剿”史。

拒绝承认战争发展道路的曲折性，而鼓吹直线论的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有王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则有“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为了彻底驳倒形而上学的直线论，毛泽东同志以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事物曲折前进的普遍性的道理。他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争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总之，“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①

前进性——是波浪式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事物发展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总趋势。事物的发展是由辩证否定所组成的链条。其中每一个否定，都是一次“扬弃”，都是联系和发展的环节，它不仅舍弃了发展中过时的消极的东西，而且保留和发扬了其中积极的东西，把事物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为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客观事物正是通过内在的否定性引起自我运动，不断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毛泽东同志谈到我军战略战术方针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时说：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已经产生出来了。后来作战原则进一步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的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了，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地是超越（否定）了从前的朴素性，但仍然保留和发扬了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丰富和发展。这科学地反映了战争本身的内在规律。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把这些正确原则斥之为“游击主义”，加以统统撤消、全盘否定。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红军已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大军和大军作战，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因而，他们提出了一套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这就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等等。并以此来代替以前的一整套正确原则。它完全背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否定观。在这些所谓“新原则”的指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经一年多的英勇战斗，终究未能打破“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结果，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受到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党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依战略性质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他说：“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①他还说：“我们要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5页

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①这就是说，不搞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要揭示事物发展的前进性。

周期性——是波浪式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经过对立面的两次否定，两次转化，就表现为一个周期。事物发展的周期性是受前进性支配和制约的，因此，它不是封闭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每一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周期的起点。事物的发展，正是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形成循环往复，螺旋发展的链条。在事物发展的周期性中，包含着回复性和回归性，就是当一个周期完成时，仿佛出现了向出发点的复归，重复起点阶段的某些特点、特征。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中国内战的特点时指出：“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②这里说的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如果说，红军打败敌人的一次“围剿”是肯定，那么白军卷土重来实行再“围剿”就是否定，而当红军再次粉碎敌人的“围剿”就是否定的否定。这仿佛由终点回复到起点，重复了出发点的某些特征、特点。这是“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不会变化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的。”^①这就是说的“围剿”和反“围剿”的周期性。

但是，这种反复的周期性是受前进性制约和支配的。战争和战斗形式上的一再反复，不等于内容上的简单重复。毛泽东同志指出：“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②“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③这正确反映了红军反“围剿”的历史。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人，以鲁涤平为总司令，红军四万人，历时一星期，打了两次胜仗，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余支，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红军三万多人，十五天内，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兵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红军只有三万余人，前后三个月中，歼敌四万三千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兵力，蒋介石亲自指挥，以陈诚、罗卓英为主力，中央红军四万人，历时三星期，歼敌三个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一百万兵力，两百架飞机，其中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蒋介石仍亲任总司令，以德、意、美等帝国主义军事专家为顾问，当时全部红军三十万人，其中一方面军十万人，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战争打了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由此可见，这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历史，无论从战争的力量对比、规模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7页

大小、激烈的程度，都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升级，而决不是简单的重复。

然而，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只承认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不承认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因此在红军还处于幼小的时代，就命令幼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打硬仗、拚消耗，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妄图使全国革命指日成功。因而给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在战争问题上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只讲前进，不讲后退的形而上学直线论。他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转变上，也体现着发展的周期性和前进性。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这里三次战略转变，同样不是简单地重复。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它用正规性的八路军、新四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因为它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将起很大的变化，这时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作战也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总之，游击战、正规战、再到游击战、再到正规战的战略转变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在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谱写了新的篇章。

三、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在研究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研究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的关系。这是因为仅仅认识了战争的规律还是不够的，重要的还必须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就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战争指导规律上的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问题，即战略学和战役、战术学的关系问题，以便提高战争指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为战略学和战役、战术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一）全局高于局部，必须统观全局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战争也是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

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这就是说，任何战争都有它的全局。战争的全局，从横的方面说，包括着战争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从纵的方面说，包括着战争的整个过程、各个阶段。战争的局部，是战争全局的一部分、一方面；而战争的全局则是战争局部的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总和。但是，全局和局部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是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场合为全局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反之，在一定场合为局部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却变为全局的东西。例如，一国的战争对于各省、各地区来说是处于全局地位，而对于全世界来说却只是一个局部。

毛泽东同志运用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去研究战略、战役和战术问题。他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②这就把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研究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阐明。他强调指出：要求战役和战术的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所以必要，这是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③这就是说，在战争指导上，只有懂得全局，统观全局，从总体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局部及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战役战术自觉地为战略服务，才能娴熟地驾驭战争，夺取战争胜利。

为此，毛泽东同志有力地批驳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错误论调。其所以是错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误，因为这种意见看不到战争的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所以，他告诫人们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① 照顾战争全局，主要是：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不但战略与战役的关系是这样，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这样。例如，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总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该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② 如果丢了主要的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

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反“围剿”时退却终点究在何处为好，必须从整个形势出发，即从全局出发。有时退却终点选在根据地前部，如江西第二、四次反“围剿”时；有时选在根据地中部，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选在根据地的后部，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退却终点的选择都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依据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也就是根据敌我态势，从全局出发而确定的。实践证明，这些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全然不讲退却，完全不顾局部形势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

和整个形势的变动，“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①

全局和局部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地位并不是平列的。全局总是属于决定的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全局的命运决定着局部的命运，全局的利益决定着局部的利益。全局并不是局部的简单综合，局部是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全局就无所谓局部。所以当某一局部的发展与全局的发展直接背离时，全局就要求克服局部的背离。这就是全局高于局部，全局统帅局部，全局决定局部。有时从局部看来，工作做得还不错，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对于全局说来却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利的，也应该认为这一局部工作不是做好了而是做坏了。相反，为了照顾全局而牺牲了某个局部，这时这一局部工作尽管没有什么发展，也应该认为这一局部的贡献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如何看待战争中某一局部的胜败得失就是最好的说明。他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②这就深刻说明了看问题不应该仅仅从局部出发，而应该从全局出发，要统观全局，把握局部与全局的相互联结，就是说要有战略头脑。

（二）局部构成全局，必须重视局部

全局支配局部，局部反作用于全局。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③这就说明，全局存在于局部之中，是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的，没有局部也就没有全局。因此，指挥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在战争的指导上，不仅要胸怀全局，统观全局，而且要懂得局部构成全局的道理，要重视局部，注意局部，为了实现全局性的战略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对全局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战争实践经验时，十分注意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为此，他做了具体分析，区分了不同的情况。一是，战争中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对全局没有决定意义，因此，有些战术或战役的失败，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二是，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破坏了，全局就会起变化，多数局部（战役）就成为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量变引起质变。三是，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是说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在战争史上，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前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就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也说明注意局部的必要性。因此，他告诫人们要牢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这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说的只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没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就必须在战役中特别是关键性的战役中去多多地夺取胜利。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时间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即“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①这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如果不这样，那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9页

果不这样，那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① 这些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深刻的道理，说明了战略和战术、全局和局部的相互制约关系。

要研究战争就必须掌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那么，怎样才能掌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这就要用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② 这就是说，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在真实的丰富的战争感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思考作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产物。由于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只要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争中的感性认识是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只有将战争的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达到把握战争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即把握战争的总体及其全局的指导规律，并回到战争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认识，去赢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研究战略问题，即研究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问题时，列举了四十对同战争全局有关的问题，其中每一组问题都是一对矛盾，构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研究各对矛盾之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的区别和联系，也要把它提到较高的原则上去解决；从而给战争的指导者指出了研究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的方向。^①

全局统率着局部，局部要服从全局。这是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这一原则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要使这一原则得以实现，要使事物的各个局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协调一致地行动，就必须在整体中形成一个中心，它能够根据全局的需要，指挥各个局部的动作。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树立局部服从全局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②但是，强调局部服从全局，绝不是排斥局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全局性问题只是全局中各个局部的一般性、共同性的问题，并不是包揽一切，也不是解决局部中一切问题和个别性问题。因此，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就存在着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在全局的共同性问题上必须坚持全局一致的方针、路线；另一方面，在局部的个别性问题上则必须根据统一的方针、路线，结合局部的特点加以灵活的运用，反对照搬照转照抄。在战争中，我们要坚持战略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相结合的指挥原则；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统一的原则，即一方面在全局性问题上应该强调统一与集中，另一方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16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面又要注意在集中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以便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个预言。他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所写的大量军事著作，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军事辩证法中极为重要、极为精彩的部分。在这里，仅从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集中与分散，运动战、游击战与阵地战，消耗战与歼灭战等方面略加说明。

（一）进攻与防御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②这就是说，进攻和防御是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所使用的两种基本战斗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的两种基本手段。敌我双方攻与防矛盾的结果，居劣势的一方表现为退却，居优势的一方表现为追击。退却是防御的继续，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其他战斗形式也无非是这两种基本形式的不同表现而已。战争史表明，进攻和防御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

在战争中进攻和防御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没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进攻，就无所谓防御，防御总是以进攻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防御，也无所谓进攻，进攻也总是以防御者的存在为前提的。防御者一方，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敌人的进攻，比如敌军兵力有多少，进攻方面在哪里，武器装备的优劣，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等等，这是制定防御计划的客观依据。进攻者一方，首先要考虑的也是敌人的防御，比如敌军防御兵力有多少，地形地物的情况，工事和火力点的设防等等，这是确定进攻计划的客观根据。然而，进攻和防御又是互相渗透的，表现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进攻者，不可能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在战斗中，对敌人某一主要方向实行突击进攻时，对自己的侧翼方面、钳制方面、助攻方面、后方基地等则必须加以防御。否则就会被抛入被动和危险的境地，这就是进攻中的防御。而防御者，也不能一味只讲防御不讲进攻。任何积极的真正的防御，都是为了击破敌人的进攻，为自己转入反攻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条件。因此，防御虽然直接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消灭敌人，为了辅助反攻或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而且，在战略上防御，战役战斗上则可以实行进攻，这就是防御中的进攻。

在进攻和防御问题上，战争中的机械论者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进攻就是进攻，防御就是防御，二者没有任何同一性。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战略防御问题是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他们往往只看到一时一地的胜利，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客观存在，一味只讲“进攻，进攻”，全然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遭受挫折或失败。另一种是惧

怕敌人，他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只讲防御和退却，不讲进攻，既不敢在有利形势下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精神上同样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同样是遭受挫折或失败。这两种倾向，往往是结合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起初是军事冒险主义，继而变为军事保守主义，最后发展成军事逃跑主义，就是典型的事例。

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伟大创造，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思想。防御，有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这是作战中的两个对立面。毛泽东同志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真防御”。^①他坚决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认为积极防御是弱军对强军作战取得胜利的唯一的正确的战略。他强调指出：“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②这两种防御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在防御中贯彻了准备反攻和进攻的思想，也就是是否把防御当作转化敌我力量对比，最后转入反攻和进攻，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胜利的手段。

毛泽东同志总是把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辩证地统一起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183页

来。一方面，他把战略上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结合起来，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的说法是：“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或叫“防御中的进攻”，这就是防中有攻，以守为攻，防为了攻。只有在战役、战斗中进攻，才能在防御中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他说：“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①另一方面，他把战略防御转化为战略反攻和进攻，这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这就是防御转化为进攻，只有这样，才能在战略决战中取得战争的胜利。这表明进攻和防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进攻可以转化为防御，防御也可以转化为进攻，这就是进攻和防御的辩证法。

战争中进攻和防御是不能分割的，二者之间的对立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们是相反相成，相互作用的。在战争中，进攻中有防御，防御中有进攻，古今中外的战例不胜枚举。

为了深入地阐明战略防御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说明了战略退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②这是积极防御的一个战略步骤，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不能迅速打败敌人，而采取后退一步，创造条件，准备转入反攻。从形式来说，它是消极被动的；从内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来说，则是积极主动的。其积极意义就在于为转入反攻而创设条件。这个战略退却，也就是“诱敌深入”的方针。为了彻底驳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列举了许多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都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机械论者，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对此，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①他紧接着说：“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战争中退却和反击的深刻的哲理，也揭露了王明一伙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不懂得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法，也不懂得“诱敌深入”是以退为进、以防为攻的道理，因而不能不在战争中瞎碰乱撞，屡遭挫折和失败。

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阐明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持久与速决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页

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①这就是说，持久与速决是战争中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②并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③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说：“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④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是：

“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⑤在《论持久战》中，他又根据对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特点的分析，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的一般的战略方针，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战略方针，即“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⑥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基本特点的分析，充分揭示了战略的持久和战役战斗的速决的辩证关系。这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毛泽东同志说：“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1—452页

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①我国古代军事学家孙子就主张“速胜”。他说：“兵贵胜，不贵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他要求军队“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势如彍弩”，“节如发机”。这些都讲战争要求速决战，是指一般战争规律而言的。但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国家里，战略上只能实行持久战而不能实行速决战。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②然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情况，抹煞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讥笑持久战是“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说这样要待到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因此，他要搞战略上的速决战，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等极左口号，要求“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想制造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革命总爆发”，结果红军遭受巨大损失。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军力上是强国，中国在军力上是弱国，这个特点就决定着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因此在战略上必须自觉采取持久战，但在战役和战斗上则必须实行速决战。这是因为，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敌人是少兵临大国、少兵临多兵，我们可以利用它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和指挥笨拙等弱点，发扬我们地大、人多、兵多和大国的优点，在战略持久战中，实行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使得很多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速战速决取得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它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①他接着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具体地阐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持久与速决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活生生的辩证法。

（三）内线与外线

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根据敌强我弱及其他特点，既提出了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又提出了战役和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方针。后者跟前者是相反的，然而却又是实现前者所必要的方针。它们既相反又相成，这同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一样，内线与外线也是对立统一，二者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战争中，内线与外线的关系，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由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基本特点决定的。一般说来，凡是处于优势的军队，实行战争的战略方针总是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外线作战的方针一般采取“分进合击”的原则；凡处于劣势的军队，实行战争的战略方针则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而其内线作战的方针一般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3页

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战争中内线与外线的辩证关系。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①在《论持久战》中又重新强调了这一方针，并指出：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不过，只是在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不同罢了。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敌强我弱这个基本特点，形成了在战争的第一、二阶段中，敌在战略上处于进攻的、速决的、外线作战的地位；我在战略上则处于防御的、持久的、内线作战的地位。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以少兵临多兵，敌虽进攻只能占领我一部分土地，而在占领区内也只能控制交通要道和部分平原地区，空出了广大地区无法占领。因此，我可以利用广大的地盘进行运动战，也可以利用敌后空隙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这样，在战略上我虽处于防御的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但在战役战斗上，对于部分敌人，我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于是，从总体上说，敌进攻，我防御，敌处外线，我处内线，敌争取速决，我争取持久；但从部分上说，我进攻，敌防御，我处外线，敌处内线，我力争速战速决，敌企图持久待援。结果，积小胜为大胜，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7页

敌人，由量变引起质变，这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达到在总的形势上敌从强者化为弱者、从优势变为劣势，我从弱者化为强者、从劣势变为优势。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打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①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谈到“犬牙交错的战争”时，揭示了内线和外线，包围和反包围的奇观。他指出：抗日战争是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但我军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个游击区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这又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在包围和反包围的问题上，从整个战争来看，敌处战略的外线作战，我处战略的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之中，但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敌之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从敌后游击根据地来看，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之中，但若将各个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页

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则许多敌人又处于我之包围之中；再从世界性范围来看，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国家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这是内线与外线辩证关系的生动表述。

（四）集中与分散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制定了一整套战场作战的方针、战术和方法，如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兵力的分散和集中问题。

兵力的分散与集中是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组成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不仅充分论述了集中兵力的必要性，而且指出了集中兵力的具体方法，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

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①这里所说的“战略头脑”，就是辩证法的战略思想。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缺乏辩证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战略头脑，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在战争中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化防御为进攻、变内线为外线时说：“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①通过集中兵力，将敌军对我军的大“围剿”，化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化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化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强者地位，化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毛泽东同志说：“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这一着”。^②这是战争中客观辩证法的生动反映。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集中兵力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列举了军事平均主义者给革命战争带来的危害后说：“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部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间内，只应有一个。”^③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但深刻地总结了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也提出了着重抓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的思想。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8页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集中兵力问题，但他又反对把集中兵力绝对化，而主张把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起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规定了红军的游击战术之一，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①并且论述了在一定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②因为，在红军还十分幼小的情况下，要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就必须充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分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那时，李立三曾主张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集中到红军手里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他指出：要“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③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说：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方法就是：分散、集中和变换（转移）。分散兵力就是所谓“化整为零”，但不是绝对地平均分散，而要保持一个重心；集中兵力，就是所谓“化零为整”，但也不是绝对的集中，而是集中主力用于某一主要方面。转移兵力，就是要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转移其位置，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这些都要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只有虚心研究、勤于思索的人才可以获得。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而提出来的指导战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针。也是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改变敌我形势，战胜敌人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的主要方法。这个方针和方法，随着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改变其形式，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以集中兵力歼灭小股敌人为主，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方法去消灭敌人，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他还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②这里的“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以少胜多”和“以多胜少”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其实是对立统一的。没有“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战略指导，就不会有“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战术原则；反之，没有“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的战术决策，就不会有“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战略胜利的局面。这种一与十、少与多的战略和战术的巧妙统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又一杰出贡献。

在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时，必须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敌军兵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不能同时攻击几个方面的敌人，而只能一个一个地消灭之。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这种作战方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1页

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随着战争的推移和发展，经过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直至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

由此可见，正确地运用兵力的集中与分散的作战方法，反映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劣势到优势、从被动到主动，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客观规律，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胜利。

（五）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和歼灭战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持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到此目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①毛泽东同志在其军事著作中，对战争内容、战争形式、战争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

依据中日双方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广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②它的基本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所谓流动性，就是“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页

退。”^①但无论前进和后退，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此，必须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又要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逃跑主义者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不懂得运动战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而拼命主义者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常是惧怕丧失一城一地，他们否认运动战的基本特征之一的流动性，不懂得得与失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②

在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是游击战。这是因为，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特别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是，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它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毛泽东同志说：“八路军的方针是：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③并指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针对党内外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从中日战争的特点出发，反复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游击战本身所固有的特殊性，因此，不能把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机械地移用于游击战。为此，他专门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深刻地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揭示了游击战争的一般规律。这是军事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整地阐明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页

游击战争的理论，揭示游击战争发展规律的著作，也是创造性地把辩证法运用于游击战争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和正规战相配合，二是向运动战即正规战发展。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他阐明了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的主次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变。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助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因此，战争形式的转变表现为：运动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此相适应，我军的转变则表现为：正规军——游击军——正规军。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是抗日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已不同于前期的运动战，而后期的正规军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同于前期的正规军。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虽然强调运动战和游击战的重要作用，但也并不否定必要的阵地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阵地战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但他认为，随着我军士兵素质的提高，技术装备的改进，新式武器的增加，在战略反攻阶段中，无疑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充分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作战形式仍以运动战为主，但随着我军技术装备的改善，兵种的增多，武器的加强，夺取城市的阵地攻坚战就逐渐提到重要地位，把大规模的运动战与阵地战密切结合起来，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战争形式的效果来说，有消耗战和歼灭战的区别，但两者也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既互相联系

又互相区别的。这首先表现在：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就是说，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所以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其次，除了战略的消耗战，还有战役的消耗战。但决不能把歼灭战和消耗战完全等同起来，一般说来，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从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战所需要的。但是，无论运动战也好，游击战也好，都要执行歼灭战的任务。只有消耗没有歼灭是不对的，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改变敌我的强弱形势，不能进行持久战，也不能争取最后胜利。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①这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同志关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完整理论，关于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消耗战和歼灭战不同作用的说明，反映了战争的流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揭示了人民战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同志指挥战争从来不是从一成不变的抽象的公式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页

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拘一格，灵活机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他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充实和发展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同一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在作战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打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朱德同志在谈到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时说：“我们用兵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①

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继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之后，在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和光辉的证实。他从实际出发，根据每个战役的具体情况，抓住决定战役全局的关键问题确定不同的作战方向，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在三大战役中，他把打分散孤立之敌同打集中强大之敌密切结合起来，把打中小城市和乡村同夺取大城市密切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同夺取城市和地方密切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同阵地攻坚战密切结合起来，把用战斗的办法歼灭敌军同用和平的方法改编敌军有机结合起来，使我军的战略战术达到了新的高度。三大战役是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战争的杰出范例。

^①《论解放区战场》第44—4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简短的结论

毛泽东军事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杰作，它是内容丰富、光彩夺目的瑰宝。在这个瑰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犹如一块整钢有机地铸造在一起。

毛泽东军事唯物论思想，集中地阐明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从事战争的目的，尤其深刻地论证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人民战争的理论核心，从而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高度统一起来。

毛泽东军事认识论思想，深刻地指明了战争中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而把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密切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精辟地阐述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战争的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尤其着重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强调指出研究和把握特殊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把辩证法、认识论、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但充分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科学真理，而且也充分证明凝结在其军事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毛泽东军事学说中的哲学思想，在今天无疑仍然是指导

我们探索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加速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同时，它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正如研究和指导战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一样，我们从事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客观经济规律。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要闯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闯出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一样，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照抄照搬所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必须象当年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找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那样，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出其特点和规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正确制定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

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还必须像当年毛泽东同志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分析问题，揭示战争双方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指明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那样，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坚持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在我国搞现代化建设，既存在有利条件，又存在不利条件，因此，一方面，要看到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客观基础的，任何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搞现代化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稳步发展，任何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主观符合客观，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去发挥自觉能动性。

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还必须象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战争中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样，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动员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完成。

总之，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要着重学习体现在其军事思想中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着重学习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做到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特殊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可能转化为现实。

第 四 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历史唯物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革命比起别国革命来有许多矛盾的特殊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的革命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带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社会革命理论。这些理论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当中。

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去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根源、基本特点和自身所固有的发展规律，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各个时期的具体纲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同时，在这些著作中，他所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而阐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社会革命理论、国家学说，以及不断革命论和

革命发展阶段论等重要思想，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许多独特的贡献。

第 一 节

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 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要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等诸问题，从哪里入手呢？要创立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什么为客观依据呢？毛泽东同志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贯强调首先要研究并弄清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把中国革命的问题放在中国的和世界的社会矛盾运动中去认识，强调要使中国革命的理论牢牢地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一、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革命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由于革命所解决的社会矛盾各有其特殊性，因而历史上发生的革命分为各种类型，比如，有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有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等。这些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不同，对象和动力也不同。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的动力，这取决于社会各阶级对这种革命所抱的态度如何，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又根源于他们在社会的经济

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正确地领导人民的革命，就必须对发生革命的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准确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性质，并以此为根据，再去确定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提出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决定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作了详细地分析，进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②而且他还曾经具体分析了这种“现时中国的国情”的由来和主要特点，分析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这些基本矛盾的运动引起的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一）中国社会矛盾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这里主要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许多别的民族一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其后才转入阶级社会，开始是奴隶制社会。“自周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①这个封建社会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漫长时间。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别的重大干挠，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改变了原来的方向，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则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第一，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基本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大量侵入中国，直接破坏了中国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即是说，由于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就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便有了初步的发展。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帝国主义为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极力阻碍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上面在这一点中所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它们割去了大片的中国土地，索去了巨额的赔款；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它们控制了在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海关与对外贸易，控制了交通事业；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以此在中国掠夺原料，廉价购买劳动力，辗转剥削中国人民，限制和束缚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利用商品输出的方式，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此外，还通过种种文化侵略，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并制造和豢养了一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

第三，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支柱。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都是勾结中国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

封建势力进行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保持中国的封建秩序，保持中国的封建剥削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优势，以作为它们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腐朽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也企图以帝国主义为其支持、鼓励、栽培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以作为它们维持统治的靠山。这样，为了反对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为了阻止新兴起的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就形成了互相利用的反动的同盟。

帝国主义支持封建买办的商业金融资本，以大量的军火、大批的军事顾问和大笔的借款给予中国的各派军阀，并以此制造中国内战，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下，中国的土地大量地集中到大地主手里，被集中了的这些土地，并不是去经营资本主义化的农场，而是分散地租给农民，以扩大剥削，进而又把在农村中积累起来的资本转变为高利贷，或流入城市转变为封建买办的商业金融资本。这样，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势力相勾结，通过了买办、高利贷者、商人，形成了由城市到乡村的剥削网，辗转压榨农民，使得中国农业日益破产，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种情况也表现了阻碍、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四，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促使了中国的殖民地化。

官僚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势力的基础上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依靠政治特权而形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是在“发国难财”、“发内战财”中肥大起来的，它的魔爪伸到了旧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实行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官僚资本主义完

全不是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集中表现。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发展起来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便是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揭露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①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天天发展，更促使中国迅速地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

（二）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矛盾。

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有哪些特点呢？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这样的归纳：

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第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

第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这些特点正好反映了旧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比如，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包括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要正确地认识事物，不仅要揭露事物本身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矛盾，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找出其中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质正是由这些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作为社会革命，正是

这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运动的结果。那么，什么是中国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在旧中国，“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②这些东西都是旧东西，而这些旧东西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两部分结成了反动联盟，而以后者为盟主。与这些旧东西相对立的则是中国的新东西，即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这些新东西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626页

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①

旧中国的这种新与旧的矛盾是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这种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尤其应该看到，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相反，它不仅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和发展了民族资本主义，而且，正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运而生了。这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新产生的以往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中国社会中新的特殊的社会阶级。现代中国革命正是以这两个阶级先后唱主角同时和别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来展开的，这两个阶级的发展变化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中国革命反映着世界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矛盾运动是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内因、根据，因而要认识中国革命必须研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历史的特点。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问题，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从新的世界事变的角度来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革命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要从中国的与世界的历史发展来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这就是说，不能把中国革命当作孤立的现象去看待，而要从世界革命的全局去研究。为此，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明确提出了两种世界革命、两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6页

种民主革命的思想，发展了两种类型革命的思想，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由和意义，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反映着世界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两种世界革命。

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①

两种世界革命是前后联结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后；两种世界革命又是互相区别的，一是领导者不同，二是革命目标不同。

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是从一六四八年英国革命开始，到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发展为典型的完备的形态。这两次革命虽然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们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②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0—321页

这两次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英国和法国，而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马克思说：“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①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1830年是最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②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开始走下坡路。一八四八年，发生了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结果却是失败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这说明，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那种旺盛的革命情绪，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继续领导革命了。而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已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这次革命的主导力量，使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具有了特殊的性质。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标志着近代无产阶级武装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发动。一八七一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出现，又是近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资产阶级的日趋没落和无产阶级的迅速成长，预示着旧的世界革命的结束，新的世界革命的到来。马克思曾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给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5页

恩格斯的信中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象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①即是说，新的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

但是，真正作为划分两种世界革命标志的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说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崩溃。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就成了两种世界革命的分界线。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这个目的的实现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历史进程），它的意义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来更伟大，因为它是用一种公有制的社会去代替私有制的社会。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由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进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也是近代世界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页

在近代资本主义反对中世纪封建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就孕育着和发展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虽然以往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①这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中已经孕育着和发展着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因素，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或者说它已不能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必然要由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代替它。而这种世界革命的交替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代而到来的，是随着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世界范围内的斗争的扩大而到来的。这种交替是通过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实现的。

（二）两种民主革命。

在两种世界革命的交替过程中，也包括着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交替过程。

十七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革命，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后来，资产阶级逐渐走了下坡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时就预感到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并且将具有无产阶级的特殊性质。

到了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前夜，列宁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②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②《列宁全集》第8卷，第229页

问题。当时列宁希望达到第一种形式的革命，而力求避免第二种形式的革命。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套用他们的观点、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①他把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叫做“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②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在明确地提出了两种世界革命的思想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两种民主革命的思想。他指出：有两种民主革命，一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③一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它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④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两种民主革命和两种世界革命的关系，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三）两种类型的革命。

列宁、斯大林曾经把现代世界各个国家的革命，分为两

①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551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种类型，即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前者是压迫别国人民国家里的革命，后者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的革命。这两种类型的革命是有严格区别的，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的。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就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两大革命巨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目标下，形成了世界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①

在两种世界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归属是不同的，以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后则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是一个局部的问题。或者是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全民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是由资产阶级代表全民族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在本民族范围内建立资产阶级统治。

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②。由于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在殖民地两对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宗主国之间）尖锐化，占领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要想成为新的统治者已经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经济同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还存在，但已经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更根本的矛盾，就是各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的矛盾，民族解放的目标不是重建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2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97页

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①

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陷入极端贫穷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到处都燃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烈火，成为打击帝国主义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时代的基本矛盾之一。

由于世界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都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在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面前同时就面临着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以往这种革命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日趋没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这种革命终不能胜利。而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②

毛泽东同志结合着中国革命的亲身经验，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种类型的革命与帝国主义资本主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3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5页

义国家那种类型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两种类型革命与两种世界革命、两种民主革命的关系。他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在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①

承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时代里是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否就等于承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就当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②

可见，民主革命的新旧之分不是由矛盾的根本性质决定的，而是由阶级关系，即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决定的。毛泽东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62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0页

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①由此可见，“一部分”同“新民主主义”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只要反帝，即使是王公贵族领导也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只要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它就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把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关键在于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有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是以“五四”运动为界限的），中国革命则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使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接替资产阶级承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引起了中国民主革命总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的部分质变，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反过来，这又使中国革命真正成了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了。

三、无产阶级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民主革命有新旧之分，这新旧之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页

的标志不在于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革命动力的改变，而在于革命领导权的转移。这种划分不是革命根本性质的改变，而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么，革命的对象无疑义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打倒这些敌人，推翻旧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革命的动力不仅有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资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性质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而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但是由于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事物不仅作为过程而出现，而且在一个大的过程当中又区分为若干个不同的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但是要从大的阶段来说，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

了。”^①这种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性转移就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历史性过渡的首要标志，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为什么革命领导权会发生这种转移呢？

第一，这种领导权的转移是与世界革命的交替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即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移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作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具备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可能性。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②

当然，这种世界革命毕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外部条件而出现的，这种外部条件必须通过中国的内部矛盾运动来发挥作用。而这种外部条件作为全局性的变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确实曾经起了一定意义上的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转移是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联系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买办，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630页

国家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以，这一部分人往往可以成为革命的一份力量。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买办资本的束缚，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代理人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又具有对于敌人的妥协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①由于整个时代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更加突出出来。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担当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第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转移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自诞生以来就在斗争中不断地成长起来。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而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可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就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独立，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并使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不仅有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而且有了自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己阶级的战斗司令部。中国无产阶级行使革命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对革命行使领导权。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毛泽东同志说过:“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众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①

总之,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则当之无愧。这种领导权的转移之时就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二节 根据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 创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和 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运动出发,进而深刻研究并找到了中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7—168页

革命的基本特点和特殊规律。他说：“（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①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部分，它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一、唯物辩证法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杰出运用

关于要在革命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历来都极为重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②他们举了在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的共产党人，只要反对党派采取革命的行动就同它们一起战斗，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随后，他们在总结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教训以及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又进一步指出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无论是参加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还是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孤军奋战，而必须有可靠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如果只有无产阶级的独唱而无其它阶级的合唱，那么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7—5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①斯大林则把统一战线的思想看作是列宁主义的带有根本性的战略指导，他指出：革命的后备军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除了本国的农民以及所有过渡阶层、邻国的无产阶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等直接的后备军以外，还有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等间接后备军。斯大林认为：这第一种后备军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第二种后备军，“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②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农民问题、资产阶级问题以及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所特有的问题。

（一）唯物辩证地分析了各种复杂的矛盾，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所谓革命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反对主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226页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50页

要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同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所结成的联盟。那么，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这是为了反对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虽然腐朽，但在一个长时期里还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三大敌人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而又以帝国主义为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打倒这三大敌人。中国人民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动员千百万民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并利用反革命阵营的一切矛盾，集中力量去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并最终完成革命的任务。

第二，这也是为了壮大革命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他又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力量较小，如果单凭无产阶级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这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阶层、党派或个人，组织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又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由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欢迎和参加的态度，所以，“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①他们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并将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是没有疑问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0页

第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①这就造成了分别替不同的帝国主义服务和代表不同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营垒内部的分裂和冲突。这样，虽然地主买办阶级从总体上讲是革命的敌人，但是，无产阶级可以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的原则，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之中的某些势力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便是一例。而且还要看到，在反动集团中也不是清一色的、铁板一块的，对他们之中的反对派和比较开明的人士是可以利用和争取的。

第四，除了有国内统一战线问题，也有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由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就要“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③

第五，除了在国内有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的问题，在国际也有这个问题。由于各个帝国主义把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当作一块最大的肥肉去争夺，一方面，他们曾经在许多场合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9页

形成过反动联盟，用以反对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又由于帝国主义之间谁都有获取最大利益的野心，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形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相互间的斗争。共产党人，要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反对最主要的民族敌人，并有区别的建立自己的政策，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二）明确指出了在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

在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有两个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在这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才能真正组成统一战线。

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实质是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理论做了很好的运用、发挥和发展。

第一，指出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通过大量的实际社会调查，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曾经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①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广大农民，只有无

^①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或《农民运动》第8册1926年9月1日

产阶级才能支持他们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说明，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有力量，才能行使领导权，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①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更为充分，更加具体。他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②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指导工作中，把农民问题做为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来对待，这就叫做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这就叫做从实质上看问题。他在全面列举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之后指出：“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③但是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

第二，指明了农民问题是党内外争论的焦点所在。

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④这两条路线尤其表现在对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页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102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3页

待农民的态度和对待土地问题上。或者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战；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打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赢得抗战的胜利。这前者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路线，后者是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①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死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反动的封建半封建的统治，为了永远地剥削和压迫农民。而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对农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农民革命的组织者、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有力量，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农民作为自己强大而巩固的同盟军。平常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包括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其中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特别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贫、雇农。毛泽东同志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内也是有争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农民的重要性，不但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反对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彻底的反封建的斗争。

“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否认有联合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的必要性，结果也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使革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5—1416页

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指出：“动摇于两者之间（注：指动摇于国民党路线和共产党路线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①

毛泽东同志对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重要性的思想正是在党内外的激烈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三）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确立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政策。

国内革命统一战线不仅有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紧密合作，主要表现为工农联盟，而且又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主要表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②由于这个特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要在统一战线中，对待中国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中，主要阐述了下面这些可贵的思想。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建立并尽可能地保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当然需要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作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比如，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我们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就曾经主动向国民党提出，共产党愿意在国民党放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承认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7页

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抗战和民主的条件下，保证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将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改名为统一国家的特区政府，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等。但是这本身就说明，这种统一战线是一定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我们党要坚持统一战线，同时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①又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这就揭示了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辩证法。

在统一战线中之所以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因为：

首先，是为了掌握住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去搞投降主义。

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这是革命导师们一贯十分重视的。因为它关系到革命的性质、方向、目的和命运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③他一再强调统一战线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④事实上，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无时无刻地不在同无产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1页

级及其政党争夺这个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只讲统一，不讲独立，那就等于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走向了投降主义。所以，毛泽东同志经常向人们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①的尖锐问题。

其次，是为了保持和发展无产阶级的阵地，而不是去束缚自己的手脚。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去发展和扩大新的阵地。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是“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②为了这个目的，还必须在统一战线中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以壮大革命力量。

再次，是要求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万勿把一定条件下的政治联盟当作思想上的绝对一致。

因为有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因而就有一个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这“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③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就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④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所谓相同的部分就是指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基本相同的政纲。即是说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政纲，即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相同。不同的部分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的一部分纲领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而新三民主义没有这些部分；（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不但有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而且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新三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的彻底性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的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①更何況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们他们所叫喊的三民主义还是没有三大政策的“假三民主义”。要坚持统一战线必须弄清这些原则区别。从思想上加强武装，无疑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9页

忘记自己的大目标，降低自己的思想水平，以免鱼目混珠。

第二，坚持革命的两方面政策，又联合，又斗争。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①正是根据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就是又联合又斗争。他指出：“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②

首先，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的、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③一方面，联合本身就是斗争的产物，联合本身就是有矛盾、有斗争的联合，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一个真理。但是斗争不是无目的的乱斗乱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一定条件下的联合，这样就不能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就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

其次，联合与斗争的程度及方式因统一战线对象的不同而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它们是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另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它们是统一战线中的顽固势力。对这两种势力都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但是在联合与斗争的程度与方式上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不完全一样。民族资产阶级从总体上来说，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是一份革命的力量，在统一战线中这一部分力量是无产阶级的不大可靠的直接同盟者。而大资产阶级从总体上来说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统一战线中它们中的一部分是作为可以利用矛盾的间接同盟者。这是两种不同程度的联合。同时，斗争的程度和方式也有区别。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争取的办法，针对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动摇态度，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争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①对待顽固势力则是必须采取反抗他们的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有三条：第一是自卫原则；第二是胜利原则；第三是休战原则，或者叫：“有理”，“有利”，“有节”。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间走向好转的可能。”^②

再次，兼顾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但不是不讲重点。要随着事物的变化及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有时侧重强调联合，有时又侧重强调斗争。例如，当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应强调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强调联合抗日，而在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又应强调斗争，而且是坚决的武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装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应强调斗争，而在其他时候又应强调联合。这种重点论决不是一点论。又联合又斗争，在统一战线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时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矛盾的“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①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巧妙的运用。

第三，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要真正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不容易，我们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懂得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两面政策，他们曾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推行了一系列“左”的和右的政策，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③鉴于这个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①

无论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否认联合，一切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尽管表现形式不同，看上去是两个相反的极端，但是，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却是共同的，即都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说他们是唯心主义的，是说他们都离开了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又具有两重性这样的实际，而是照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说他们是形而上学的，是说他们都违反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搞绝对主义，片面性，结果他们自然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典型。

二、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0—571页

式是武装斗争，而且这种武装斗争又是走着中国式的特殊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以至全国政权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而反动的统治阶级是决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他们总是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和镇压革命运动。因此，一切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用革命的暴力才能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的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①列宁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并把暴力革命的理论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②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并且在全世界革命者面前树立了以城市为中心，先夺取城市，然后占领农村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典型。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不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而且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又树立了一种崭新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以至全国政权的典型。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主要形式和正确道路的理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所作出的一个最伟大、最光辉的贡献。毛泽东同志这方面的理论比较多地集中在《中国的红色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同志又从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农民问题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上具体阐述和发挥了这一理论。

（一）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第一，这是由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

次革命的民众。”^①

毛泽东同志在对中国情况作了具体分析之后，得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决定了革命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革命首先在农村取得胜利和建立长期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的结论。这就发展了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可能首先被突破的理论。

第二，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又长期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决定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且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革命力量（特别是革命军队力量）还很弱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夺取城市以至全国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②

第三，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群众这一特点决定的。

正如在统一战线问题里所讲到的那样，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③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1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8页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①这是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革命军队人员的主要来源；农民是革命军队给养的主要供给者；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②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首先是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当薄弱而革命基础又比较好的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积极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再以此为出发点，不断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这就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二）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〇年初是初步形成阶段；从一九三〇年初到一九三六年底是进一步发展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底是形成系统化理论的阶段；从一九四〇年初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是这个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并取得全面胜利的阶段。

第一，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曾有机会参加过革命战争，但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帮助指挥官们做政治工作和在地方上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国民革命军打仗特别是北伐战争。当时并没有充分利用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利时机，以主要力量去组织和发展自己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而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2页

^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6页

是用了很大力气帮助国民党去训练和扩充军队。“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①因此，就我们全党来说，当时对武装斗争问题是缺乏明确认识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发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二百多次起义，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进入了创造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创造了我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革命在以后年代里的胜利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群雄奋起的年代里，把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在一九二八年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初步形成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深入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而找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性，提出了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理论。

到了一九三〇年初，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在继续发展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正如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可以看作是“乡村中心思想”形成的标志。^②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些思想：第一，指出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②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第二，明确提出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第三，坚持认为，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第四，严肃批评了犯着急性病或有悲观思想的一些人的主观主义错误。^①毛泽东同志在阐述了上述思想之后坚定地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了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二，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在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又顶着新刮来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潮而创立的，创立之后又面临着新的斗争。从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大肆地攻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甚至一再剥夺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发言权。但是真理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在毛泽东同志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很快，并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而在王明抵毁毛泽东同志这一理论之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却遭到了惨败，在苏区和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些胜利和挫折，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于一九三六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9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5页

年十二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第三，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系统化。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迅速建立了许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所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革命的“道路”的概念，并且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中国要走相反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同志对他关于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作了一个基本的总结。那就是：（一）研究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首先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二）中国革命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武装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①（三）中国革命在农村区域首先取得胜利存在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四）中国革命的不平衡状态、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都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后的文章，不但直接继承了已经形成的理论，并在一些具体方面进一步具体化和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为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不断地增添着新的内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页

容，从发展阶段来说，这属于第四个阶段。

（三）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个理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提供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杰出地运用、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唯物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就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①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②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上面讲的是普遍、共性、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普遍、共性、一般是不能离开特殊、个性、个别而独立存在的，而且它们也不能全部包括所有的特殊、个性、个别。作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理论在具体应用时还需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即是说，“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不同而不一致。”^①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讲到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时候，他指出：“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②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进行革命时，应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这要根据本国的情况和具体条件而定。中国所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因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③

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世界意义，特别是对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因为这些国家大都具有同旧中国类似的特点。但是，正如中国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现成经验一样，别国的革命也不能照搬中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17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7页

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中就说过：“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①

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毕竟是树了一种革命道路的新类型，它的意义及其影响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是深远的。

第三节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的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并进而为中国革命规定了正确的、完整的路线、纲领，论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为革命人民提供了无比锐利的思想武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毛泽东同志根据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继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基本纲领，即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又对这三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7页

纲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当时阶段的具体纲领，即三十九条具体要求和十点说明。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阶段上，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呢？

第一，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现阶段的中国既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能建立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为什么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除了中国社会性质这个决定因素外，还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缘故。

依国际环境说，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早已走上了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的，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它平起平坐。新民主主义“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①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能够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已经懂得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翻身解放，不允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受新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的剥削和压迫；具有“一身二任”两面性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条件、没有资格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顽固派已背叛革命，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一心要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以上都说明，中国革命不能走欧美许多国家早先成功地走过的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老路了。那么，是不是能马上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路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也不行。虽然这条路是要走的，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新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①

这样说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②

第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指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形式的意义。

“国体”和“政体”，这是国家问题上的两个范畴。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而“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

国体问题，表现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住各种国家的真正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基于这个认识，把全世界现今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国家，按照国体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即旧民主主义国家。这是资产阶级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民专政的国家。某些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类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即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世界上现今最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在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而第三种类型，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国家。

关于这新民主主义国家形式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③并进一步指出：尽管

“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63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

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三种国家形式的区别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中采取新民主主义国家形式的必要性、必然性和过渡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来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政体，是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它要与国体的要求相适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②但是，决定国家的性质的还是国体，如果仅仅从不同的政体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不仅不同类型的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例如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比较多地采用“议会制”，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则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且同一种类型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或政权构成形式。例如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有的一度还采取过法西斯制，在议会制当中又分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等等。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较多地实行“议会制”，说成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

“民主”的国家。其实，这是一种欺骗，列宁曾经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63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8页

共和国内也是这样。”^①又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②毛泽东同志也尖锐地指出：

“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③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加以区别，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来区别各种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与欺骗的一个重要方法。

要重视国体，但也不能轻视政体。因为国体与政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问题，是国家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国体决定政体，同时政体又反作用于国体。我们不仅要揭露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政体的虚伪性，而且也要研究自己国家的组织形式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着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实行专政。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具体表现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形式，既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体现了各阶级的联合，并充分表达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最有力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这种形式，“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209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页

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① 这种形式是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体制相适应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② 指出：“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③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政治是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在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的同时也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实行“节制资本”，即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实行“耕者有其田”，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这个纲领，后来毛泽东同志明确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④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其中包括劳动人民的个体经营和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以国家经营为领导力量。它的性质是非资本主义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但同时又是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的；是非社会主义的，但同时又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须采用的过渡经济形式。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工商业问题方面。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它是靠没收或接管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而得，后来毛泽东同志明确规定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又明确规定，新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是要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是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消灭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新民主主义国家容许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中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保护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②对于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还要提倡并保护它的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③又说：

“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

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①

其次，表现在土地问题方面。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毛泽东同志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②我们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就是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要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要没收一切土地来分配，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要严格保护中农的利益，因为中农是农村中必须巩固团结的对象，而且还要容许农村富农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部分的存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的时候，但是国家也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谨慎而又积极地引导农民逐步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鼓励和扶植合作社经济，这种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③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紧密联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101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640页

系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又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给予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因而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不仅是为着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且也是为着中国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那么，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②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五四”运动以前，曾领导过反封建文化的斗争，可是因为它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很快地就被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所结成的反动同盟打败了。在“五四”以后，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比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它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也没有资格继续承担中国文化革命的领导责任；又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则成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所以，这个新文化的领导责任，也就历史地、必然地落在这个新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666页

生力军身上。

当然这种以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反帝反封建的。就其整个内容来说还是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第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又有半封建的文化，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②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为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才能救中国。他们到日本、欧美学习所谓“新学”，来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但结果，换来的却是帝国主义越来越残暴的侵略，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而外，跟着就是文化侵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略。这时，所谓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不是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就是做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而真正称得上中国新文化的东西，却是在“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证明，没有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坚决斗争，就没有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蒋介石反动派所豢养的号称新文化的所谓“欧美派文化”，其实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买办文化，为的在中国传播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它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死敌。

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就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民族尊严，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文学艺术，是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表现，它同民族的习惯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没有民族的特点，就不会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对于外国的有益的东西应当学习，但必须“洋为中用”，学习外国的东西，目的是为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他批判了当时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所谓“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和一些人的形式主义的错误作法。

新民主主义文化又是科学的文化，就是说，必须反对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认真清理，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以继承，做到“古为今用”，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在思想战线上，毛泽东同志强调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要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宇宙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混淆两者的界限。“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②

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大众的文化，它必须为工农群众服务。“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这不仅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普及和提高，而且“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④毛泽东同志向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提出接近民众的任务，并且要求“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⑤

总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

毛泽东同志断然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建成了这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所谓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实质上讲的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以及上层建筑内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指的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指的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政党、政治团体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艺术、哲学、宗教观点等等。文化这个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狭义的文化专指观念形态。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实际上说的是社会意识形态。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义论》中讲的“政治”主要指的是国家制度。这样，他所讲的经济和政治都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文化则是作为社会意识的东西，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实质上讲的又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

（一）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历史唯物论中有一个根本的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它的发展变化。又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意识还直接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并为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都是为建立和巩固一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①又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在中国有旧文化和新文化之分。所谓旧文化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这当中又包括有各种成分：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贩卖以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東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种旧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文化两兄弟结成的反动同盟，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所谓新文化，在当时是与上述旧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它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种新政治新经济在当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因而这种新文化自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二）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反映。

既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也就必然引起文化的变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这时期的新文化是替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即为了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服务的。虽然这种新文化在当时有一定的革命作用，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新文化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结果还是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②

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是为反对帝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五四”以后，中国不仅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①毛泽东同志称赞鲁迅先生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如同在政治上讲，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文化革命也是世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②

（三）一定的文化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伟大影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在《矛盾论》中说过：“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

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①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阐述了 this 观点，并指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②

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文化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和革命军队中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革命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把文化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的重要性时，几次都提到列宁在《怎么办？》中讲到的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进而他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⑤只要认真吸取中国人长期因思想武器的陈旧和不适用老打败仗的历史教训，就可以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和第2卷，第56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2页

具有何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这个观点出发，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文化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科学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①

总之，任何社会总是一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者、历史唯物论者，我们一方面坚定地承认一定的文化是受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决定的，同时又毫不怀疑一定的文化会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第四节 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辩证法， 阐明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 论的辩证统一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一八五〇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针对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范围的论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看成是自己的最终目标，而要在民主革命之后“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②同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再次提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③的伟大思想。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④，实际包含有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重要思想，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中，一方面指出：

“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⑤而且“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⑥同时，又指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⑦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将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

⑤《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⑥《列宁选集》第1卷，第641页

⑦《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①而且在实践上真正实现了这种过渡，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不但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这种理论。

一、量变质变规律是不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论述量变质变规律时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量变与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关系的最好的说明。他告诉我们，要从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去分析量变与质变的规律。事物矛盾的两个侧面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所谓量变，就是事物矛盾的两个侧面在其相互斗争中的渐变状态、相对静止状态，是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所谓质变，就是事物矛盾的两个侧面经过斗争，发生了矛盾双方的根本易位，是矛盾运动中的飞跃状态、显著变动状态。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不仅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生量变和质变的原因和动力，而且说明了量变质变是事物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发生转化的途径和状态。

关于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问题的考察和说明，是毛泽东同志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量变质变规律理论所作的突出新贡献。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②这就在实际上表述了事物部分质变的原理。这一原理说明，事物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发生根本质变以前，总是处于总的量变过程中。但事物的发展不仅是通过不断的量变，而且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还包含着许多部分质变，即事物发展过程内部的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变化。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要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质变中有量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没有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即根本质变也不会到来。

毛泽东同志正是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建立在质量互变规律的基础上。他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既须承认发展过程的不间断性，又须承认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既须懂得照顾全局的必要，又须懂得关照各局部和各阶段的必要性（因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这就清晰而明确地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①

中国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骤。”^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九二一年建党以来我们党处理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经验总结，是对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思想的杰出运用。

一九二一年七月，我们党在成立时曾确定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並沒有提出分两步走的思想。到一九二二年七月，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国社会的特点，我们党在举行“二大”时就原则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主张：第一步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第二步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②这个分两步走的主张，也就是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但是，由于当时整个党毕竟处在幼年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而且只能是浮浅的。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做两步走的思想，使我们党对于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阐明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首先，这两种革命性质不同。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不同的特点：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②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侵略，还要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同，它要解决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一切私有制，从而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其次，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相互联系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这就深刻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毛泽东同志曾十分形象地把这两个革命过程比作上下两篇文章，他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②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全面展开，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易建立，对广大群众的革命教育无法公开进行。这是与一些独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同的情况。面对这种特殊情况，在中国首先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解放的第一步，为以后进行社会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义革命作必要准备。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①

（二）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高纲领，也是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②这就是说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不过是实现了最低纲领，还必须去实现最高纲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便宣告革命终结，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后，它将宣布新的革命的开始。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③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也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标志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必然突出起来，由原来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样，革命的性质就因此而发生变化。

（三）反对割裂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两种错误倾向。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理论，曾经遇到了社会上和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它们进行了坚决的严肃的斗争。

第一，反对“一次革命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雇佣了几名御用文人，利用孙中山早期的主观社会主义的观点，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鼓吹所谓“一次革命论”，并企图把不同性质的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从而否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理由，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为投降日寇制造舆论。

我们党内有些人也被“一次革命论”所迷惑，宣传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粹主观的想法。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①“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②他们“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叫做：“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总是急于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4页

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并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甚至把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有矛盾而积极要求抗日民主的中间势力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这样做的结果，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批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是“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②指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③

第二，反对“二次革命论”。

还有一种从右的方面割裂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关系的错误倾向。比如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所鼓吹的“二次革命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次革命，应当归资产阶级领导，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只是争得一些民主自由的权利。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以后，无产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多数，再利用已经取得的民主、自由权利，准备发动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把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理论变成了所谓“二次革命论”。按照这种理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助手，不应当领导农民去进行土地改革，也不应当组织军队去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第一次大革命的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后期，陈独秀等人极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又逐渐变成了对中国革命的取消主义者，“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①可见，所谓“二次革命论”的要害是取消革命，它不仅要取消社会主义革命，而又由于它所主张的民主革命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它也在实际上取消了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二次革命论”，指出：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②又指出：“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③

不管是“一次革命论”，还是“二次革命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思想实质却是共同的，它们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必须分做两步走的思想，正是在反对这种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

三、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

上面已讲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当然不是自然，可能不等于现实。由于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由于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由于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因而就产生了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来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出来的“两个前途”的问题。

一个前途，民主革命不成功，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路上去，继续维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样子，这是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前途。希望在中国实现这种可能性、这种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中的反动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另一个前途，把民主革命搞成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从而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又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种可能性、这种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那么，实现后一种可能性和前途，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需要哪些条件呢？

第一，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握取全国政权，是实现转变的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成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①这种可能性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可能性，而是具有明显现实性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掌握了全国政权，这是革命转变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条件。

要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最重要的是在民主革命中牢牢掌握住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②只有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才能保证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才能掌握住全部国家政权，从而才能实现革命的转变。

第二，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断增长是实现革命转变的必要条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被推倒，就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必然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的结果，还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①这种社会主义的因素指的是什么呢？从政治上讲，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从经济上讲，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当时实际上是指革命根据地）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有了这种因素的不断增长，以至发展到夺取全国政权，并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加之其他有利条件，便会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终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不能不具有极大的现实可能性了。

第三，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实现革命转变的一个决不可少的条件。

较之十月革命以前的各国民主革命和五四以前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遇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对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作了详细地分析，他说：“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①这种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②这个有利的环境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和胜利之后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决不可少的条件。

在革命转变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反对和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他总是要求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当条件成熟时，不要保守，要敢于胜利；当条件不成熟时，不要冒进，要耐心细致地工作，积极准备条件。在革命转变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抗日战争前，毛泽东同志就针对那种“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的错误思想说：“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③

俄国革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若从一九〇五年民主革命算起到十月革命，也只有十二年时间。而中国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却经历了二十八年时间。中国人民夺取政权，是经过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砸烂反动政权，又一块一块、一片一片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长期发展过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标志着革命转变的开始。但是，民主革命所遗留下的一些任务，是在建国后继续完成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146页

的。到了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终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既重视质变、飞跃，在条件成熟时敢于实现革命转变；又重视量变、渐进、部分质变，在条件不成熟时为革命转变积极准备条件。毛泽东同志很好地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活的运用。

简短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基本矛盾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指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根源、主要特点和内在规律，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具体纲领，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从而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直接继承，而且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成果，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一个极其出色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面，

同时，又是历史唯物论的重要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包含和体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半点书斋的味道，而是充满着革命的和批判的精神，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哲学。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要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专著，而且要读象《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样的充满着哲学思想的科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曾经为进行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指出了明确的战斗方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证明了这个理论的真理性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发展着的各国人民革命特别是有类似中国情况的国家人民革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我国今天已经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很多思想特别是这个理论所提供的一般的思想方法却是仍然适用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要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入手，同时又要考察国际环境的变化思想；关于要下功夫找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进而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的思想；关于要正确认识文化与政治、经济辩证关系的思想；关于要根据具体国情及时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的思想；关于要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我们不能丢掉、不能违反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长期摸索、艰苦奋斗，终于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

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要用老一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索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正确道路，并且也一定要获得伟大的成功。

第五章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实践活动，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①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还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②这条思想路线贯串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

①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7页，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人民的产物”、“真正的哲学”，集中了人民最珍贵的精髓，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一节 实事求是辩证唯物论 思想路线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这个古老的思想命题，作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规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②经过这样精辟的解释，就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从而使得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

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主席用中国语言概括起来，在党校的大门写了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④这不但指出了实事求是是党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概括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

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是从实际出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③《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还是从主观出发；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又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②列宁也一再告诫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③这就清楚地说明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同志把尊重规律、尊重事实的思想，概括为“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④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⑤因此，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同上第4卷，第311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倡导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在批评康梁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时就指出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去“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①他提出“讨论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的思想。一九三〇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一九三七年，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更是系统地论证了实事求是。在四十年代初，特别是延安整风时，他更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把主观主义看成是党内思想的大敌加以反对。在解放战争时期，面临复杂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③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一再教育全党，要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文，是他在这个时期系统论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代表作。一九六一年，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可以说，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革命

①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增刊第1号，1919年7月

② 《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和建设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凡是坚持这一原则的，革命就顺利，就成功；凡是违背这一原则的，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二、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这是两条思想路线根本对立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①列宁说：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②斯大林说得更明确：“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③可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后，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出了系统的发挥和发展。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我们的三大作风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③《列宁主义问题》第16页

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明确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更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后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更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以党的整个历史为中心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但作了最完整、最系统的充分论述，而且彻底贯彻在革命活动中。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目的时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①毛泽东同志还对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他强调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③这不仅尖锐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也为我们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同志还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说明了理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和实践的真实关系。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①这就是说，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

在我们党内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教条主义者把“本本”的知识神圣化，经验主义者则把局部的经验凝固化，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②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但指出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而且指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

为了使全党同志真正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把它规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这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③并指出这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三、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首要前提，只有搞好调查研究，才能达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强调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省情、县情，因此也就不可能制定改造世界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批评那些不作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者时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②鉴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总是坚持不懈地进行“详细的科学的实际的调查”。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邬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以及《论十大关系》等等，都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光辉范例。

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

①《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调查研究必须有个科学态度。这个科学态度，就是跟群众做知心朋友，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①“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切身经验的总结，深刻指明了作好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也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思想。

除了态度以外，还有个方法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对不对头，直接关系到调查研究结果的正确与否。在这里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一种是，尊重群众，尊重事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因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人们的认识是第二性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有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才能找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计划，方案。另一种是，自以为是、从主观出发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有的是不深入群众，不接触实际，凭主观臆断；有的是先入为主、划框框、定调子，作好结论，然后去凑材料、找事实、寻根据，不是要思想去符合客观事物，而是要客观事物去符合思想，这是极坏的实用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去作调查，去分析问题和解决矛盾，是没有不犯错误和不碰钉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8页

义。”①“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②这说得何等中肯和深刻！

搞调查研究也有个立场问题。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进行调查，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分清敌我，辨明是非，识别方向，坚持真理，从而得出正确的科学的调查研究的结论。同一事物，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得出相反的结论。正象列宁所说：“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③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侵蚀和影响，也时常自觉不自觉地从小主观出发，去搞所谓调查研究，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毛泽东同志认为，调查研究不仅要提出问题，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这就需要系统、周密、反复地进行调查以及分析和综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矛盾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

①②《反对本本主义》单行本，第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2页

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① 这是对于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的精辟的阐述。只有经过实事求是地周密的调查,并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才能发现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规律。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而实事求是则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把这条思想路线推进到实践领域,他告诉人们怎样去正确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

第二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 哲学思想的根本点

3 实事求是不仅是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核心,而且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我党历史上,不论是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理论上一般都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从主观出发,从本本出发,而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亦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还是背离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党内部唯物论和唯心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高度统一。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①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坚持反映论；背离实事求是，就必然抛弃唯物论，抛弃辩证法，抛弃反映论。

一、实事求是与唯物论

什么是唯物主义？

恩格斯总结了人类几千年来哲学发展史，深刻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还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③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④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于任何外来的成分。”^⑤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从客观存在出发，即

①《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5页，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

从自然和历史出发，是哲学唯物论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根本原则。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给物质下了一个定义，捍卫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他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他还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②一句话，物质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阐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恩格斯、列宁哲学唯物主义思想的中国化的表述。实事求是，肯定了物质（即“实事”）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即“是”），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肯定了这个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也肯定了客观存在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不然就否定了去研究（即“求”）的必要和可能，就会滑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可见，“实事求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就是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根本原理，从离开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在哲学上叫做存在的，在实际工作中就叫做客观世界、实际情况、工作环境、工作对象、群众条件、群众需要，等等；在哲学上叫做思维的，在实际工作中就叫做路线、方针、政策、意见、计划、方案，等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等。因此，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的观点，同恩格斯所说的“存在”、“自然界”的观点，同列宁所说的“物质”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

然而，必须指出，实事求是同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一致的基础上却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是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化为方法论，并具体贯彻到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实际活动中，成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的高度，解决了精神和物质、思维 and 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既然，“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因此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坚持研究（“求”）客观规律（“是”），反对主观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谈到辩证法的要素时说：“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①就是说，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出发去把握事物，才能认识客观世界本身。他说：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②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地看问题。他在《矛盾论》中用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客观看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题。”^①他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他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

实事求是，就是要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内部的联系，揭示周围世界的内在矛盾，弄清事物发展的方向，作出科学的预见。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②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

二、实事求是与辩证法

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曾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定义。他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④列宁说：“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⑤他还说：“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⑥这些论述深刻地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辩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⑤⑥《列宁选集》第2卷，第583、442页

法的宇宙观，主要的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毛泽东同志在“实事求是”中所讲的“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规律性，也就是辩证法。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论述“实事求是”这一问题时，指出：“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②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很好的说明和发挥。实事求是，就是要把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同实践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

客观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要坚持实事求是，这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阶段，拿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事变，遗弃了新事变中所包藏的性质上的变化，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完全错误的境地。每一个革命者，能否正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能否防止思想僵化，善于使自己的主观认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能否从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客观实际，是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同志说：“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推移转变，即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①一切事物都是合乎规律地产生、发展、灭亡着，任何一个思想和认识，如果不反映客观实际的规律性，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本来面目，那就要在实践中遭到挫折或失败。

客观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物质世界。因此，要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把握事物的多样性。物质是运动的，但每一运动形式都有它的特殊性。人们认识物质，就是要认识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对于物质运动的每一种形式，不但要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的共同点，尤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它和其他运动形式区别的特殊点。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也就是要认识每一事物的具体的矛盾特殊性。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②他又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③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全面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从而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深刻发挥。

客观实际是千差万别的，又是千变万化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认识、揭示和掌握这些差别和变化，即认识它的矛盾多样性，找出其规律性，并据此来确定我们的对策，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解决问题。决不能稍有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②《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得，便沾沾自喜，导致思想僵化。

三、实事求是与认识论

什么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给认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们提出了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说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规定，也是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③列宁还认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④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是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运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的典范。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⑤他还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这就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更明确的回答。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论述“实事求是”的问题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实际，最终只能经过社会实践来解决。”^②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

毛泽东同志在“实事求是”中所说的“‘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求”，就是从“实事”出发，找出“是”来，即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出发，找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来。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求”，包含着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即找出客观规律，作为行动向导；从实际中来，回到实践中去。因为，要“求”出“是”来，就必须通过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同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也才能运用客观规律。然而，要达到“求”的目的，要如实地反映客观

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事物及其规律性，还必须在占有大量的可靠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从“实事”中“求”出“是”来，找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并运用它去指导实践。这一过程就是认识的辩证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它体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作出的可贵贡献。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实事”是发展的，“是”也是发展的，因此，“求”也应当是发展的。实事求是，从本质上说来，就是要求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照搬照抄、思想僵化，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充分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求”的精神，也就是创造精神，是人类特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实事求是，不是无所作为、夜郎自大的懦夫懒汉的世界观，而是革命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扬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的指导原则。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人们越能充分发扬与客观实际相符的自觉能动性，就越能深刻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越是深刻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也就越能充分地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使认识和实践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发展。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所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因为，它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它简洁、明

晰地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与认识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来表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具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特色，以及它所富有的独创性。

第三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我们党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明确规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当然也是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进展，它无疑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它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应当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就初步提出来了，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表述，但已相当深刻地阐明了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通篇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它指出了只有深入群众去作实际调查，才能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实现这个结合；它论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科学真理。因此，可以说，它既讲了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问题，也讲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文献。

一、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①邓小平同志也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②这说明了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什么是群众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③这就告诉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二是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坚定地相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②《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4—5页，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①列宁也说：“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②毛泽东同志则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因此，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提出斗争的方向，组织人民群众自己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④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点，也是实事求是的基本点。用“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而“实事求是”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人类，造福人类，要达到最终目的，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制定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1044页

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的概括，指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内容，揭示了群众路线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也说明了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群众是认识世界的主体，又是改造世界的主体，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而实践又主要是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既是认识的源泉，又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所以，共产党人必须依靠群众的实践来认识世界，又必须依靠群众的实践来改造世界。正确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必须来自群众的实践，又转过来为群众的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是：“实践——认识——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公式是：“群众——领导——群众”。因此，“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深入群众，投身实践，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形成理论、思想、路线、政策的过程，也就是由实践到认识、由个别到一般、由物质到精神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把集中起来的意见，把制定出来的理论、思想、路线、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和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补充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认识回到实践、一般回到个别、精神回到物质的过程。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往往必须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从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认识就“一次比一次更正

确、更生动、更丰富”，使实践和认识不断地深入和发展。因此，否认实践、否认辩证唯物论认识路线，就必然否认群众，否认党的群众路线；反之，否认群众、否认群众路线，也必然否认实践、否认辩证唯物论认识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思想觉悟程度出发，超过了群众的实际就是“左”，落后于群众的实际就是右。毛泽东同志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①因此，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来，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二者的统一，体现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统一，二者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

总之，毛泽东同志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把辩证唯物论认识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有机统一起来。这样，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给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群众路线的运用，又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从而把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统一起来。这就更好地保证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更好地保证了正确制定和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二、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4页

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①这就说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实践表明，独立自主，离开实事求是，离开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抛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不可能有革命和建设成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探索前进的道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的有机的统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②这就说明了独立自主和国际援助的相互关系。在哲学上说，独立自主和国际援助，是内因和外因、根据与条件的关系，二者是既相反又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时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③这就深刻地阐明了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的辩证法。

①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①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全军全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夺取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的任务，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②

但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说不要外援和拒绝学习外国长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的东西。那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去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当然，根据我们的力量和可能，也要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建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78页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设事业。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辩证关系的原理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运用。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我们在任何工作中都要坚持这个原理。

三、实事求是与重点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①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顺利地实现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这说明了实事求是和重点转移的内在联系。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②从革命战争转移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③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④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转移？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了生产力

① 《红旗》杂志1979年第1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与生产关系发生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即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提出来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这里所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主要矛盾。这给我们指明了革命转变、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基本原因。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代表旧生产关系的三大敌人已被推翻，原来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的方向，主要矛盾转化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革命的重心也必须随着转移。这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内在根据。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我们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取得了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紧接着，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逐步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由于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逐步改造的方针，因而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工作中存在着某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

的胜利，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结果，这又使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新的转化。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并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的基本任务。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明确提出了党的中心工作的战略转移。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①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②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展，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主要矛盾转化的重点转移，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然而，在二十多年中，我们没有实现这个转移。其中原因很多，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阴谋破坏以外，其基本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当时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出现了少数右派分子捣乱，因而对“八大”所作的对国内阶级形势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发生了动摇，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而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违反客观实际的错误估计；二是，对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缺乏研究和认识，在实践中夸大主观能动性，盲目冒进，急于求成，过高地估计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超越阶段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生产力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从根本上说来，所以没有实现这个重点转移，就是因为没有牢牢地抓住真正的主要矛盾，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左倾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误。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党的工作在一段时期中徘徊前进的局面，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

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①

《决议》还说：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根据我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所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所作出的重点转移。要真正实现转移的战略决策，也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那么，现在我国的基本国情、基本特点、或者说矛盾特殊性是什么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是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某些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还未改变基础差、底子薄、水平低的落后面貌；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但对丰富资源尚未全局在胸，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勤劳智慧，自强不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有振兴中华的志气，但人口多，密度高，增长快，负担大；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上还必然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等等。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正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①《决议》接着从国内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精神文明、民族关系、国防建设、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总结为十条，并逐条地作了精辟阐述。这十条广泛地全面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主要之点。后来，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决议》的十条精神指导下，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在经济建设领域内又提出十条具体方针，这是对《决议》的十条的补充和发展。这十条新方针，总的精神就是要“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②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在新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新的实践。过去，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今天，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又找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今后，我们仍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丰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其所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因为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单行本，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不仅贯穿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而且贯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抛弃了它，就等于挖掉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就等于丢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

简短的结论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灵魂、出发点、根本点。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正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我们党六十多年来的战斗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挫折、前进和后退、巩固和发展，都是同坚持实事求是，还是背离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紧密相联的。实践表明，我们党的一切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

回顾六十多年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怎样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又是怎样一再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使我们深深懂得：要想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兴旺发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牢牢掌握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和核心。总结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为了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壮丽的事业，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他还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他把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与失败的高度，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的道理。

^{①②}《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7页，红旗出版社，1981年版

结 束 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包括着广泛的方面、丰富的内容，它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八篇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只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部分，是其中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系统化的两篇代表作，是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是为全党进一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而准备的理论武器。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导，那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则是《实践论》、《矛盾论》在多方面的展开。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几篇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光辉的范例。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既有继承丰富又有创造发展的关系，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根本特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我们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这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而切实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门科学，因而在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反对那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任意拔高的错误倾向，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这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又要反对那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任意贬低的错误作法，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真理，否定它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更是不能容许的。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它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这是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前提。

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就要满怀热情地、积极认真地去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那些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和处理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的，从而沿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向，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紧密结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50—5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实践，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必须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都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的理论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按照正确的方向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哲学。对于它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必须维护，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就必然要犯错误。但是，绝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句句是真理”；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再也不需要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这种观点本身就违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新的实践既向哲学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又为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经验，努力反映最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注意掌握思想理论战线的新动向，及时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的新问题，等等，从而提出新的见解、新的理论，用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的职责。

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和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越发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事业的科学价值，它必将被更多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手中的尖锐武器；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将会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完备的形式，它必将不断地以新的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新的光辉。

后 记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一书，是我们在进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发表后，我们又根据《决议》的精神，进行了加工、整理和修改，并增写了新的章节。本书，是宋一秀、陈战难、杨梅叶同志共同写成的。全书由宋一秀同志修改并定稿。

本书的写作，是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八篇著作为主线，这不仅是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需要，也是因为这八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理论、军事理论、政治理论的代表著作，而且又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但是，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八篇著作之前就已产生，在这之后又有新的重大发展，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论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以便能系统地完整地去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还很粗浅，尚待进一步深入。本书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地方，甚至挂一漏万，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作 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于未名湖畔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宋一秀等 _ c _ _
作者 =
页数 = 3 7 1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时期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完全成熟时期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光辉发展的时期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时期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从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上，充分发挥了“实践活动的唯特主义”
	二、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地论证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从世界观和文法论结合的高度上，集中论述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四、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
	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研究军事科学，对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作出了崭新的贡献
	六、致力于哲学的解放和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简短的结论
第二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
第一节	《实践论》、《矛盾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物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共产国际指标神圣化的结果
	三、它是指导新时期伟大斗争和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需要
第二节	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二、实践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基础
	三、两个飞跃是主客观矛盾统一的辩证途径
	四、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和党的群众路线
	五、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第三节	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二、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三、要着重找出主要矛盾和主矛盾方面的特殊性

	四、具体把握矛盾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五、正确认识 and 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简短的结论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发展的新篇章
第一节	唯物论在战争中
	一、战争的起源和本质
	二、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从事战争的目的
	三、兵民是胜利之本
第二节	认识论在战争中
	一、战争中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二、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基础
	三、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四、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
第三节	辩证法在战争中
	一、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
	二、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三、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
	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
	简短的结论
第四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历史唯物论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一节	根据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一、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革命反映着世界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地产阶级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第二节	根据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创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唯物辩证法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杰出动用
	二、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第三节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四、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法
第四节	根据中国社会的客观辩证法，阐明了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
	一、量变质变规律是不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哲学基础
	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三、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第一节	实事求是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核心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
	二、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三、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调查研究
第二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
	一、实事求是与唯物论

二、实事求是与辩证法

三、实事求是与认识论

第三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

一、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

二、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

三、实事求是与重点转移

简短的结论

结束语

后记